觀察

第四卷　第四期

專論

內戰論　楊人楩

廢除剝削與增加生產　施復亮

紐約通信

總統的災難　楊剛

外論選譯

美國對華政策的冒險　Nathaniel Peffer

通信

關於鄉土工業和紳權　費孝通

觀察通信

國大召開前夕　觀察特約記者

劉戡陣亡西安震動　觀察特約記者

縱談東北大局　觀察特約記者

關於雲南最近一連串的民變的詳細報告　觀察讀者投寄

文藝

故國風光　戴鎦齡

讀者投書

居然有這等事　時代背景與學術環境

武大兩教授病逝　「小總統」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工作綱領讀後感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59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二十五萬
掛號：三十萬元
航平：三十六萬
航掛：四十萬元
郵資漲價，請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售價：每冊三十萬元
郵費：掛號每冊一萬　航掛每冊十一萬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三千萬元
普通　全面二千六百萬
半面一千四百萬
¼面　八百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五千
航掛退：二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居然有這等事

編者先生：關於國大代表的糾紛，已鬧多時，現在離三月二十九日國大召開之期不遠，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大家非常注目。今天上海中央日報載該報南京十五日專電，謂國民黨中常會於十五日集議，對此已提出了一個具體辦法，卽國大代表由中央提名的和簽署當選的雙方分期擔任，卽發生糾紛之一方担任二年，另一方擔任四年。中央日報並載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總督長洪蘭友的談話，說中常會所決定之調解國代退讓糾紛辦法，在法律上未始不能通行云云。國民黨政治道德的墮落，已爲世所公認，於此大局危急之秋，不自行反省，改變作風，反而變本加厲，措置失常，一至於此，眞是可嘆！請問全世界各國的選舉中，那有一個代表由兩個人分期担任的辦法？我覺得一個政黨糊塗也不致糊塗到如此地步，一個政黨墮落也不致墮落到如此地步！未能當選的人硬要使之當選，政治上的自私竟然表演得如此淋漓盡緻，眞可嘆爲觀止矣！

許文靜　三月十六日　上海

時代背景與學術環境

編者先生：最近蕭公權先生在政治大學發表演說，對於胡適之先生所提出的爭取學術獨立十年計劃有所批評。蕭先生以爲這個計劃太注重「環境」了。在安定的「環境」中，學術思想固然會發達；但在混亂的「環境」中，學術思想也會發達。蕭先生舉出了中國春秋時代和西洋希臘文明時期學術的發達，作爲例證。不錯，中國的孔、孟、荀、老、墨，都生長在混亂的時代中，也都在混亂的時代中完成他們的哲學系統；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也都在希臘文明開始動搖時立下了不朽的功業。可是這是學術的「時代背景」，不是學術的「環境」。在春秋時代和希臘文明時代，學術之所以昌明，是因爲要適應時代的需要——舊的制度沒落了，新的制度還沒有找到，社會陷入混亂的狀況，大家起來找尋答案，於是學術開始發達。

但「時代背景」決不是「環境」。前者指時間，後者指空間。學術的環境是學校。春秋戰國時代學術之所以發達，是因爲孔子開辦了一個學校，集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同樣的，希臘學術的發達是因爲蘇格拉底廣收門徒，柏拉圖創立 Academe，亞里斯多德創立 Lyceum。沒有優良的學校，學術是決不會無故發達的。

所謂學校，是就其教授與圖書設備而言。有了好教授和完足的圖書設備，學術的發達才有可能。亞里斯多德爲什麼會有輝煌的成就，就是因爲他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肯替他搜求材料；亞歷山大每征服一地，便將該地的史料送去給老師。假如亞里斯多德沒有這些材料，也許他不能對人類文明有如此偉大的貢獻。所以中國要求學術的進步，學校的改善實爲當前要務。但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作，尤其是國家財政支絀的今天。所以胡先生提出了他的十年計劃，以社會的力量來改善大學。他的方法是由少數而及於全體。雖然我們覺得胡先生所提出的學校似乎還有商酌的餘地，但我們對於胡先生所提出的原則和方法是無可非議的。

今日中國社會混亂已極，正是大家起來尋求解決方法的時候。學術發達的時間的條件既具，空間的條件則要看我們今後的努力如何而定。至於蕭先生所說的不要太注重「環境」，是我所不能完全同意的。

陳啓達　一月二十一日　南京

武大兩教授病逝

編者先生：武大眞不幸，最近連死了兩個教授。一個是工學院的劉樹楨教授，因爲心臟病死於武大醫院，臨死時家裏僅留有二十多萬國幣，但劉教授家裏還留有一妻一兒二女，都是亟待救濟的。假如不是武大師生的捐助，恐怕劉教授還要光身入土。可憐！可痛！

劉教授死後不久，哲學系系主任萬卓恆先生又以心臟病兼肺病死於同仁醫院。萬先生服務武大十八年，湖北黃陂人，年四十餘，聽說尙無家眷，所以經濟負担較輕，不需同學捐助就安葬了。

作爲一個大學教授，在一個正常的國度裏，國寶人師，是多麼的令人尊敬，令人重視啊！可是時至今日，教授死了，如果沒有窮學生們的捐助，便會光身入土，這個世界太慘酷了！中國人心太毒辣了！

劉萬兩教授之死，當然是學術界的損失，國家的損失。於情於理，我們除沉痛的哀悼之外，應該使其家屬於短期內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可是在我們的國度裏，活著的教授的家屬，都活不下去，沒有人管，何況死了的呢？唉！這是誰在作孽，誰的罪惡？

我們爲劉萬兩教授哀痛，我們爲我們自己傷心，我們更爲中國前途一哭！

光・譚　三月十日　武昌

「小總統」

編者先生：江西上饒民鋒日報於本月十日發生了一件小小的風波：原來九日的中央社電訊是：……擁戴蔣主席競選大總統，但經排錯爲競選小總統，經王專員發覺後立卽嚴究，謂此事侮辱蔣主席過甚。該報社一時如臨大難，其後將校對和排字工人提禁法院，幸經該報社主持人竭力營救，得法院的同情與幫助，謂被害人未會起訴，不能謂爲犯法，被捉禁者始獲保釋。次日該報刊一緊要啓事，解釋十日報紙外埠不能發出的原因，然而在無意中等於將這件事宣揚了出去，所以當日該報又經政府禁止發行。

×××　三月十二日　上饒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工作綱領讀後感

編者先生：本月一日北平成立了一個新的團體，定名爲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同時公布三十二條工作綱領，計分爲政治主張，外交主張，經濟主張，社會及其他主張四個部分。此會領導的人頗多知名之士，包括實業界教育界中堅份子，於是社會上便發生種種的傳說，說這是中國「新第三方面」者有之，說此會是司徒雷登所支持者有之。它已相當引起人們的注視。

關於這個會的一切詳細情形，固然尙有待今後報導，不過它的性質及主張目標，大體上已經可以看出來了。我以爲這個會並非政治團體，更非政黨，所以說它是「新第三方面」，似乎離題尙遠，可是說它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社會團體，恐怕也非事實。或者說它是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一個新社會團體，似乎近於事實些。

在現在這種沉悶，各階層有心人都在追求新出路的時候，只要有人肯出來向革新的方向努力，不論用什麼方式，我個人一概贊成。因爲再長此窒息下去，人們的精神的痛苦超過物質的痛苦，的確是國家的最大危機。所以由比較有社會地位的人士，先站出來拿出鮮明的主張，號召更多的民衆，使政治上的空氣流通流通，客觀上大有必要。同時，我個人一向很恭維英國的費邊社同工黨的關係；可惜中國還沒有一個費邊社，學術界的朋友們是有其責任的。

仔細看了三十二條工作綱領之後，我個人十分滿意。其中雖然（下接二十頁）

本刊傳統

一、所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 第四期

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

本期作者

楊人楩：北京大學教授
施復亮：前四川省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
楊　剛：大公報駐美特派員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illegible]齡：武漢大學教授

內戰論

楊人楩

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awsky）在其遺著「自由與文化」中說：一切戰爭都可視爲人類的內戰。我們願意接受這樣廣義的解釋，事實上我們却習慣於一種較狹義的定義：所謂內戰（Civil War）只是同一民族中之自相殘殺的戰爭（Fratricidal War）。內戰在進行時，可能有種種名稱，如云「戡亂」與「革命」；但旁觀者及後人都要目之爲「內戰」。美國的南北戰爭，官方稱之曰「戡亂」（The war of the Rebellion），南部稱之曰「南北戰爭」（The war between the States），正確一點應稱爲「南部獨立戰爭」（The war for the Southern Independance），一般人却稱之曰「美國的內戰」（The American Civil war）。英國的內戰也有兩個對立的名稱：「大叛亂」（The Great Rebellion）及「淸教徒革命」（The Puritan Revolution），多數史家却在用「內戰」一辭。歷史上的內戰會有被稱爲「神聖戰爭」（The Sacred War）的，但在今日看來，仍是「內戰」。

有史可稽的民族，似乎都會有過窮年累月的內戰。古希臘的內戰一打就是一百年（紀元前四五九——三六二），誰也不能預料現代希臘的內戰要打到那一天爲止。羅馬在其和平盛世的前後，有過兩度的百年內戰（紀元前一三〇——三一及紀元後一八〇——二七〇）。中古歐洲之所謂「私戰」（Private Wars），是封建諸侯武士們的日常工作；打得太多了，以至不得不藉助於宗教的力量，用「上帝和平會」（Pax dei, 989）及「上帝休戰令」（Treuga Dei, 1041）一類的法寶使他們在最冷和最熱的日子去打。到了近代，內戰的性質更複雜，宗教的力量再不能有限制內戰的功用，反而成了製造內戰的因素；暴力似乎成了解決糾紛——甚至精神上的糾紛——的惟一方法。

各民族之所以不免於內戰，是否由於蠻性的遺留呢？馬林諾夫斯基已指明初民社會中是不常有內戰的。戰爭是工具，內戰是用來解決用其他方法所不能解決的內爭之工具。訴之理性的忍讓、諒解、協商等方法失敗以後，便不免訴之於暴行；暴行招致暴行，最後演變爲長期內戰。不幸所有的內戰都不會解決牠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古希臘人的雙重內戰——邦與邦之間及一邦的內部糾爭——始終不會使任何一方面滿足，結果只先後便宜了馬其頓人與羅馬人。羅馬人的內戰是爲着改革及保全共和國，結果却產生了武人獨裁與帝政。中世紀的私戰非但不會解決其所要解決的爭端，反而更生出新的爭端。那一次宗教戰爭會眞正解決信仰問題呢？英國內戰後情況，原非初起時任何一方面所要求的。在美國的南北戰爭中，先動手的南方要求保全奴制及建立獨立的聯邦，二者都失敗了；北部似已達到了牠所要求的目的——廢奴及統一，可是廢奴的理想尚有待於一個相當時期來實現，至於統一却是一個心理上受了傷害的統一。這次戰爭雙方所耗去的戰費爲四、七五〇百萬美金（損害及善後用費不在其內），以之贖償所當解放的黑奴綽綽有餘，這便是內戰的諷刺。

戰爭是集體的犯罪，內戰尤然。對於「率土而食人肉者」，孟子認爲「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可是今日戰禍之慘烈，又豈是兩千餘年前的孟子所能想像的？身受長期內戰災害的我們，當能深切地體會出此一罪惡所產生的後果：一、生命的傷害——傷亡、瘟疫，與屠殺；二、物質的毀滅；三、經濟的崩潰；四、人權遭受蹂躪（譬如林肯，亦曾取消人身權）；五、外力的干涉；六、文化衰落；及七、道德墮落。有些史家認爲戰爭有溝通文化的功用；內戰却連這一點用處也沒有，因爲牠是發生在同一文化的民族中。道德墮落是無形的損害，然而也是最足以斷喪元氣的損害。參加內戰的一方，爲着要克服其敵人，不免要猜疑、嫉妒、虛僞、欺騙、陰謀、甚至有喪失人性的殘暴。處於夾攻中的人民，爲着生存，不能不降低其道德水準，以期逃過砲火與猜防的二重威脅。人生態度倘非流於厭世與玩世，便是投機取巧以苟活，敢於堅持一己的操守而與現實鬥爭的，定是少數中的少數。內戰時期愈久，好人愈不易生存，留下的縱非全是壞人，却可能是些懦夫與鄉愿。

討論內戰的後果，但我就譯了希臘史家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所寫希臘內戰史中的一段。兩千餘年來有不少的人唸過這一段東西，可能誰也不會如我們今日這麼親切地領會牠；因此，我要不嫌其長來將其迻譯於后：

「此後不久，幾乎整個世界都在激動中；在每個城邦中，民主派與寡頭派的領袖們在鬥爭着，前者勾結雅典人，後者勾結斯巴達人。……在戰時，不滿足的一黨自易藉助於外力來打擊其敵人以有利於自己。……剝奪了日常生活所需的戰爭，是一個難於應付的主子，會使人們的性格變化，以便合於情況的需要。

「城邦中一旦發生了事變，參與事變的人便要充份發揮其革命精神，決然要以巧妙的手段與兇殘的報復，來勝過其前人之所能表示的。字面的意義已與實際無關，可以隨着他們的意思來曲加解釋。……狂烈的能力被視為人類的眞實性格。想求安全的間謀者就是偽裝的卑怯者。喜歡暴行的人始終能得人信任，反之則被懷疑。陰謀而成功的人是智多星，能破壞陰謀的人，更偉大。自始不曾參加陰謀的人，就是破壞黨紀；有懼敵之罪。總之，能搶先去做壞事的，或鼓勵好人去做壞事的，都在被稱頌。黨的結合勝過了血統的結合，因為黨徒更可不追問理由去冒險。信心所根據的並非神聖的法律，而是共同犯罪。得勢的一黨提出良好的諾言時，其敵黨決不會以善意來接受，却只審切地注視其行動。報復較自衛更被重視。當雙方不得已而宣誓遵守一個協定時，惟有在雙方無可作為之時，此一協定才有效。可是，當一黨遇着先下手的機會，乘人不備以打擊敵人時，他們對於這樣不守信義的辦法較公開的報復行動還更感覺愉快；他們很高興他已採取了這樣一個較安全的途徑。……

「這一切罪惡的原因就是爭權，……及黨派精神……。因為兩黨的領袖都好話說盡；……他們在名義上都說為着公共利益，實際上却都以之為掠奪的對象。……不屬於任何一黨的公民便成了雙方的犧牲者，或者因為他們不參加內爭而遭忌，或者簡直不願他們生存。

「在希臘，內爭產生了種種邪惡。構成高貴性格的主要因素的純樸性，被人輕視而消失了。到處都暴露不顧信義的敵視態度，誓語既不足以使對敵者結合，信誓亦不足以使他們妥協。誰都覺得一切不可靠，必須顧及其自己的安全而不敢信任別人。智能較弱的人反而最易成功。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的弱點，明知在言論上既敵不過敵人，在罪惡的行動上亦將受制於敵人，故只有先發制人，馬上動作。……」（譯自 Benjamine Jowett 英譯本卷一頁二四一—二四四）。

這樣長期的內戰腐蝕了希臘人的心靈；雖曾一再有人呼籲和平，可是始終不會為好戰者所接受。到了羅馬與迦太基角逐之時，Agelaus of Nanpactors 仍在呼籲停止內戰：「只要稍微留心一般情勢的人，就該明白：無論是迦太基人征服了羅馬人或羅馬人征服了迦太基人，勝利者總不會滿足於西西里與意大利那個天下的。他們仍會要向前進，他們的勢力與計劃之所要擴張的，當遠過於我們所希望的。」這是先見之明；先見之明限於少數人始終是無用的。

長期內戰往往會斷送一個民族的政治生命，至少會使此民族停留在落伍的階段。從歷史上看是如此，從現實上看亦無例外：現今仍為內戰所苦的國家，決不是進步的國家。反之，所有今日的文明前進國家，沒有一個不是因終止內戰而開始進步的。美國當南北戰爭時，在任何方面都是一個不足重視的國家；可是，自內戰停止（一八六五）以後，八十年的時間使牠躍居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英國內戰結束以後，再沒有獨裁，再沒有武力統治，因而也沒有反叛與內戰；查理二世以來的政體是多數統治而不是一黨專政，是避免內戰的而不是製造內戰的，因而英國已有將近三百年的繁榮。法、俄、德、意諸國之所以能成為進步的國家，主要因素之一即為避免了窮年累月的內戰。比利時原是一個因偶然際遇而產生的國家，根基並不鞏固，但因未受內戰之害，故得列入進步國家一類。

內戰不能解決問題，避免內戰而另覓途徑却往往能解決所要解決的問題。能否另覓途徑，則有待於政治家之抉擇。政治家原是有野心的——「野心」並不一定是個壞辭，但須能與自制配合。政治家之所以能自制，是由於有明晰的認識與正確的判斷；根據整個的實際情勢來衡量一切策略的後果，認清了某一策略的後果有悖於其信念時，然後運用其自制力來放棄此一策略——例如說內戰。野心不能與自制配合，便是冒險——冒險家不根據認識來「判」斷，只有盲目的「決」斷，這就是賭博。政治家需要判斷，冒險的野心家才肯賭博。

讓我們拿這個標準來尋覓現代史上的政治家，看他們是否會運用其自制力來避免內戰。華盛頓在其第二任總統任期終了時，絕無「捨我無人」之想，毅然聲明不再參加競選，為美國民主政治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先例。在他的告別書裏，他指示國人團結統一而勿勾引外力，以避免內戰。惟團結，美國始能存未來與自由，始能免於武人獨裁而消除地域的差別。一個民族對於外國有所好惡，無異是奴隸，是「好與惡的奴隸，二者都足以使牠貽誤其職責與利益。」「同情於所偏愛的一國，易於產生一種想像的共同利益，實則並無所謂共同利益；而且會把他人的仇敵當作自已的仇敵，以致毫無理由地加入人家的爭吵與戰爭。……牠會使野心，腐化，而迷惑的人（即對於某國有偏好的人）容易犧牲本國的利益而不受譴責，有時甚至可得着人民的擁護；使那些因野心、腐化、或癡迷而發生的卑劣愚蠢行為，在外表上看像是合於道義，順從輿論，或有利於國事的。」因此，他更懇切地求美國人民相信他：「一個自由的民族，應該時刻小心來防止潛在的外力之詭計，因為歷史與經驗證明外力是共和國政府最有害的敵人之一。」未能接受華盛頓之指示而發生的美國南北戰爭，幾不免於英法勢力之滲入；幸而內戰為期不過四年，而戰勝者的自制力能以寬容態度對付戰敗者，才使華盛頓之具有遠見的自制能不失却其指示途徑的作用。在性格上和華盛頓恰恰相反的俾斯麥，是一位不願妥協的獨裁者，他的鐵血政策既已一再成功而不曾失敗過，看樣子似乎要以武力為後盾來完成其最後一步的統一工作。然而他不願挾戰勝奧法之餘威來征服南德各邦，反而要運用交涉讓步的方式，甚至容許巴威略及威騰堡各邦保留軍事、郵政、鐵路、甚至外交的自主權。就其性格及其在當時所具的聲威而論，他肯如此讓步，是頗使一般人覺得奇怪的；何況如此讓步曾引起了普魯士朝野的反對。只緣他是一個能自制的政治家；他的認識使他知道惟讓步始可避免內戰；內戰是冒險，就算能統一德國

，也會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讓步所得到的統一，誠然是他所不願的；可是，只要能避免內戰而不留下傷痕，他所希望的統一畢竟能漸次循其他途徑來完成。當俾斯麥以其自制力來使德國避免內戰時，甘必大亦在同樣地使法國避免內戰。拿破崙第三投降以後，共和派甘必大是主持繼續抗戰的領袖人物之一；當他正在波爾多組織外省武力的時候，巴黎已經投降敵人，而且訂定了屈辱的停戰條約，這是他所不願接受的。甘必大是位年少氣盛而頗具野心的人物，波爾多的群衆正在示威要求他獨裁來繼續領導抗戰；然而他能逃避這種誘惑，他知道如果堅持抗戰，即不免內戰，內戰與他的兩大目標——抗戰及建立共和國——相矛盾；於是他表示：既已被控為獨裁，頂好退出政府。他的自制使法國避免了內戰，而他仍然有機會為他的二大目標努力。上述三人都是頗知權術的政治家，再讓我們來看一位頭腦比較單純的武人。被稱為意大利建國三傑之一的加里波的，在政治上原是加富爾的敵人；當他統率着「千人軍」征服了兩西西里以後，加富爾卻要從他手中把整個征服地接收過來。這原是他和他的部下所不願意的；然而他畢竟自願功成身退而且謝絕一切的報償，使意大利的統一完成；這固然是得力於加富爾之能够在武力以外另覓途徑，而最值得重視的卻是加里波的之自制：他明白他如果不放棄政權必然是內戰，內戰和他的目標是矛盾的。

從上述諸例看來，內戰是可以避免的，但須當其事者能够自制。可是，政治家須在某種環境中始能發揮其自制力；倘使現實情況不能範圍其感情，不能領導他去運用其自制力，亦屬無用。像俾斯麥諸人，如果是生逢只知有內戰的環境，恐仍不免為內戰禍首。必須有一個不容許內戰發生的環境，使掌握實權的政治家不能不運用其自制力而懸崖勒馬，始可避免內戰。能否認識環境而發揮其自制力是政治家的工作；能否形成此一環境則屬每一個人民的工作。政治家不能擔負他這個工作，必然毀滅他自己，同時也會毀滅整個民族的福利；人民不能負擔他們這個工作，亦必毀滅自己及整個民族的福利。防止將起的或終止已起的內戰，不能完全仰望於當權人物的自制，因為不够政治家條件的人往往不知有所謂自制；反之，人民應當發揮其力量，強迫政治家來運用其自制力以限制其野心，然後才有避免內戰或終止內戰的可能。

★　　★　　★

以上是歷史的檢討，再看現實。歷史不重演，我們今日的內戰，不同於希臘的內戰；今日的美蘇也非當時之羅馬與迦太基。民族意識是否會勝過階級意識，尚有待於事實來證明。由歷史演變出來的事理卻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可使我們明白內戰有百害而無一利，內戰不能解決問題，進步的國家決不應有內戰，內戰終止之日就是進步開始之時；內戰必須避免，假使已經到了兵連禍結的地步，必須從速終止。

「乃知兵者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可能這是為內戰辯護之最好的理由。就算是「不得已而用之」罷，究竟用到那一天為止呢？「長痛不如短痛」，然而現在已經不是短痛。「不得已而用之」的意思是說，其他途徑均已無用，惟有訴之戰爭；可是，戰爭是否有用呢？國民黨的武力既然不能在於短期內消滅共產黨的武力，同樣，共產黨的武力也不能在最短期內消滅國民黨的政權。國民黨方面可能有人在想：不妨再打八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時，再把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一同來解決。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會發生？何時發生？發生以後，美蘇是否一定會對敵？孰勝孰敗？戰爭結束時與中國問題關係若何？對於整個中國國民的利害若何？對於這一連串的問題，任何有遠見的人都不敢給以肯定的答案。答案既然不肯定，硬要等世界大戰來解決中國問題，等於是賭博；政治家應當根據現實來判斷，賭徒才肯以僥倖心理去碰運氣。有賭德的賭徒是拿自己的資本去下注；拿全國人民的福利來做賭本，在賭徒也是一種不可原諒的罪行。美援是可能利用的賭本，然而不是可以隨便利用的；本錢不够，也就無從僥倖起。借錢來賭曰濫賭，賭品亦不高。

中共為着達到其最終的革命目的，似乎不怕長期內戰：長期內戰可以拖垮國民黨，同時也可以其災難來結集更廣大的革命群衆。但是，拖垮國民黨已不是短期間的事；就是拖垮了國民黨，中共的革命未必就算完成。中國的內戰在某一意義上看是階級鬥爭，因為有無數既得利益階級在堅持反共的內戰；但在另一意義上看未必完全是階級鬥爭，因為堅持反共的未必一定都是既得利益階級，「清算」的武器對於這些人是不適用的。中共苟能打倒一個與之對敵的政權，卻不一定能防止另一與之對立的政權之再起。中國問題就是這麼複雜的，所以在三十餘年的內戰中，先後更換了若干批不同形態的戰士；內戰如再延長下去，可能出現更新形態的戰士。同時，我們不要忘卻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環，要離開世界問題來單獨解決中國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就算中共不怕長期的內戰，究竟要長到一個什麼程度呢？革命的目的在解除人民的痛苦，內戰卻給這一代人帶來了不可忍受的災難。中共雖然有一個美麗的遠景，可是，為着下一代的福利而犧牲這一代的福利，則喪失了革命的意義。長期的革命往往可使革命變質，史有先例，這也是不能不考慮的。內戰可能是發動革命的工具，決不是完成革命的工具，內戰延長往往會越出革命所應走的軌道。羅馬會因人民痛苦而革命，因革命而內戰，因內戰而犧牲了共和國，於是喪失了原有的革命精神；此後雖然有所謂兩百年的和平，可是，這樣的結果未必是今日中共人士所希望的。武力革命誠然是不可免的，可是長期的內戰亦可毀滅革命；急速的革命行動可以解除人民的痛苦，長期無止境的內戰只能使人民陷於萬劫不復之境。

美國南北戰爭時，南部反戰者曾發出「富人的戰爭窮人來打」（Rich man's war and poor man's fight）的呼聲。大抵所有的內戰，除了中古歐州的少數「私戰」以外，多半是富人的戰爭窮人來打；這便是內戰更覺可恥而不能解決問題之故。假使內戰之一方是「窮人的戰爭窮人來打」，其他的一方是否會在良心上感覺醜實呢？是否會感覺到戰爭再無法打下去呢？

自衛團；有一位專員視察某鄉的自衛武力，命令鄉長添購槍枝，鄉長認為不須添購，因為多了就要得罪共軍。對於此種態度可加以「騎牆」的罪名嗎？人民不需要戰爭，只想在內戰砲火交織下維持其生存。他們可以接受「真正的」三民主義，他們也不拒絕徹底的共產主義，但是他們決不歡迎足以毀滅其生存的砲火。一方面要他們戡亂，一方面叫他們革命，雙方卻都不能保護其安全；他們隨時可因一方面軍隊之撤退而被拋棄，也隨時可因一方面的軍隊之進駐而遭受報復。在拋棄與報復的循環之下，倘使要生存，只有準備隨時接受任何一方面的統治。求生存的意志，逼着遭受戰禍的廣大民眾採取此種態度，逼着所有不願參加內戰而又無法反抗內戰的人民也採取此種態度。無論國共雙方所賴以鬥爭的基層份子是如何龐大（在這些基層份子中恐怕已有不少人準備隨時接受敵方的統治），畢竟只佔全國國民的最少數；不願參加內戰的大多數人民，至少應有求生存的權利，因而有希望停止內戰的權利。

內戰所帶給我們的災難已夠受了，人民無居可安，無業可樂，國家的一切都在毀滅途中；前人所用以形容戰禍的話，如「滿目瘡痍」、「廬舍為墟」……之類，都可適用於今日。假使還要為國家保存一點元氣的話，這樣的內戰實在不能再打下去了。拿宣傳誘惑人民來支持內戰，是自欺；拿暴力壓迫人民接受內戰，是玩火。內戰總該有結束的一天，現在應當是時候了，愈遲愈壞。文章寫到這裏，恰好報紙上透出了和謠；雖然是謠言，然而在全國人民心理上已起了巨大的反應，可見人民是如何地渴望結束內戰！如何和法呢？這不是本文所當答覆的問題。我們只希望謠言能夠成為事實，所以我們也願意使謠言成為事實。在「關於中共往何處去？」那封信中（觀察三卷十期），我曾說過「中共具有終止或縮短內戰的權力，我們不能不希望牠考慮如何運用此一權力」。當時有讀者來信說明中止內戰是雙方面的事，不能單獨求之於中共。我們當然不會那麼天真希望中共單獨放下武器來挨打。現在卻已到了中共運用此一權力的時機：倘使不能以武力革命來縮短內戰，便該把握時機來終止內戰。在戰場上牠已然是主動者，又何妨採取主動來爭取和平？內戰發展到現階段，國民黨亦當覺悟：繼續內戰只是一種盲目的冒險，其結果不但會喪盡國家的元氣，同時亦將斷送其自身的光榮。人民既已厭戰，和談又是一個更適於解決問題的工具，為什麼不拿這工具來代替戰爭呢？政治家的自制既能避免內戰，自然也能終止內戰；必須雙方的領導人物儘量運用其自制力以表現其忍讓精神，始有和談之可言。假使真有和談，將不免一番要價還價的周折：這種交易而退的分贓方法，當然不是人民所希望的。雙方的領導人物，應從遠大處着眼：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距離，今日的局面與此二理想間的距離更遠，雙方果有實現其理想的決心與誠意，首先應該共同努力來改善今日的局面。未來的天下，應靠法治來爭取；「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用武力壓迫不能使用武力的人民眾接受一種統治，雖然發出勝利的獰笑，終不能掩飾其凶殘之醜態。假使已若自由民主還有一點教育功能，那麼，支配着未來和議的，應當不是論價爭秤的買賣人作風，而應當是眼光遠大的政治家氣度。交易而退不免再有交易，結果還是內戰；惟有爭取法治的制度，才能撲滅間歇性的內戰。中國問題固然是世界問題之一環，同時也是構成世界問題的一個因素：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來解決中國問題固然是賭博；眼見第三次世界大戰無望而暫求妥協以觀變，仍然不免是奴才氣。我們要拿出做主人的骨頭自求解決，使中國問題成為一個解決世界問題的重要因素，不必本着奴才心理讓世界問題來解決中國問題。

和謠畢竟是和謠，由和謠而生出的幻想也畢竟是幻想。欲使和談實現，尚有待於掙扎。誰來掙扎？誠如司徒大使在其致中國人民書中一再所強調的：「最主要之力量仍為中國人民。」人民不要內戰，所以有權利來要求和平。在「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文中（觀察二卷十一期），我曾說明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是自由主義者的道理，今就內戰關係而論，更可看出此一差別，因為國共雙方正是內戰的打手，而自由主義者是反內戰的。我們也曾說明自由主義者能深知廣大民眾的痛苦；現在人民既已急切地需要和平，自由主義者便應當起而爭取和平以減少人民的痛苦。「自由主義者」一辭可用來指種種不同類型的人物，但是我們必須再指出：自由主義者至少是不願有內戰的，因為他們是些不憑藉武力來爭是非的人物。我們看見若干所謂自由主義者在為內戰之一方張目，這些人物無異已變成了國民黨或共產黨而非自由主義者。當司徒大使在毫無顧忌地使用「內戰」一辭之時，有些所謂自由主義者竟怯懦到要避免「內戰」一辭；假使這不是鼓勵內戰，至少是願意接受內戰，二者都不是自由主義者所應有的。時至今日，自由主義者應當有勇氣來呼籲和平；自由主義者不為和平努力，更有誰肯為和平努力？難道定要奴顏婢膝地等待美蘇已有默契壓迫中國結束內戰時，再來附和呢？自由主義者的和平呼聲可能很脆弱，可能被堵住，但在不會被堵住之時，必須喊出。中國的內戰像是泛濫的洪水，牠已淹沒了一切，甚至淹沒了人性；任何一個中國人決無站在高坡來觀賞其泛濫之理，遲早都會遭波及的；假使不急加疏導的話。我們要警告不敢正視內戰問題的人：這個勢將全面波及的洪水，決不會容許任何一個人打逃避現實的如意算盤！同時，我們要提醒忽視內戰問題的人：內戰問題不解決，一切建設文化等事業都無從着手，因為牠已鎖住了一連串的問題之最後的一環！

根據史例來推測，沒有內戰的國家之進步可能是很快的。給我們十五年和平，讓我們安居樂業來恢復元氣；再給我們十五年和平，我們可成為一個法治而再無內戰的現代國家。一代的時光不能算久，就是今日的中年人也來得及直覩太平盛世，然而必須馬上結束內戰！

如欲免避加價　務請從速定閱

廢除剝削與增加生產

施復亮

張東蓀先生最近在「觀察」第四卷第一、第二兩期上連續發表了兩篇極富教育意義的文章，說明自由、平等兩者與生產的關係，我讀了非常高興，一則因爲他給了我不少的啓示，二則因爲他的見解在基本上跟我完全一致，祗在所用術語及說明方法上有些差別。近五、六年來我所發表的全部經濟論文以及主要的政治論文，都是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爲目標的。我之主張保護民族工商業和發展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完全爲的要增加生產，決不是爲着要維持剝削制度。這一點，在討論自由、平等問題和未來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的時候，都不能不加以愼重的考慮。

張先生在「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一文裏說：「無論如何講自由，講平等，若與生產發生衝突，換言之，即使生產反而降低，則決不能成功」。「所以在自由與平等的打算中，必須把生產列爲最重要的一個決定因素」。「凡社會改革（或革命）而能使生產增長的就能站得住；使生產降低則必會被反革命所推翻」。「如果社會有計劃性，則只能有計劃以內的自由與計劃以內的平等，而斷不容有超計劃的自由與超計劃的平等。計劃是以增加生產，使全體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爲目的的，則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產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產降低，則都應該在限制之列」。他又在「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一文裏說：「一班落後國家的問題並不是如孔子所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實在同時亦患寡。所以這樣的國家要走上社會主義必須把寡與不均同時解決。在不違背社會公道的限度內，有些國家還得要保留若干資本主義的形式，用以獎勵生產」。「所以落後的國家由封建而要一跳即到社會主義，其所行的不是以經濟革命爲主的社會革命，乃必是以政治革命爲主的社會革命」。「須知不平等固然是不公道，但有時嚴格的平等亦會產生不公道」。「即使社會翻身到某限度爲止。在限度內生產反可以增加；反之，過了限度必致生產受影響，弄成降低」。這些都是極正確的意見，都是綜合多年「歷史上的教訓」而得的「寶貴的」「常識」，値得每個關心中國前途的人特別是從事改革運動的人加以冷靜的考慮和靈活的運用。

原來古今中外，一切具有進步意義的經濟改革，其基本內容就是生產力的提高；一切具有進步意義的政治改革，其最後目的也在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換句話說，任何進步的政治經濟改革，都要以增加生產爲主要內容。當前中國的改革運動，當然也不會成爲例外。

從生產的觀點來看，所謂社會的進步，就是指生產力的提高，也就是實行擴大再生產；所謂社會的退步，就是指生產力的減退，也就是實行縮小再生產；所謂社會的停滯，就是指生產力的不變，也就是實行單純再生產。一種生產力，必須在一種生產關係內來進行，也就是必須在一種經濟制度內來進行。只要那種生產關係或經濟制度大體還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大概那個社會也還能够維持存在，儘管它裏面包含着種種矛盾和弊病。

資本主義制度，當然是一種剝削制度。站在被剝削者的立場，當然要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但是我們要知道：第一、剝削制度的產生，乃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同時在歷史的某些階段還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動力；第二、雖然同屬剝削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却已比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要進步得多，在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之下，一般勞動人民的地位和生活也已比以前提高得多；第三、要根本廢除剝削制度，必須先大大地提高生產力，造成廢除剝削制度的物質基礎。

剝削關係的存在，由於社會有了階級的劃分：一部份不生產的人握有生產手段，另一部份從事生產的人反而沒有生產手段或只有很少的生產手段。在單純商品生產裏，生產者雖然自己握有生產手段，但因爲一則生產力很低，二則必然會從其中產生資本主義，所以決不能靠它來廢除剝削關係。要想眞正廢除剝削關係，只有實現社會主義。而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和有生力量，已經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內培養出來。

資本主義雖然是一種剝削制度，可是它在歷史上却有過很大的功績：第一、它提高社會的生產力，超過封建社會幾十百倍；第二、它推翻封建特權（雖然在有些國家不很澈底），建立民主政治（雖然是資產階級性的）；第三、它發展科學文化和高度技術，普及並提高一般人民的文化水準；第四、它提高勞動大衆的地位和生活，促進他們的覺悟和團結，使他們成爲新社會的創造者。任何反對資本主義的人，都不能抹煞資本主義的這些功績。我們之所以不欲無條件地反對資本主義，也是這個緣故。

資本主義最大的毛病（也是它的基本矛盾），第一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它的狹隘的生產關係早已阻礙其無限偉大的生產力的發展，因而造成失業，醞成恐慌，對外侵略，發動戰爭，以空前浪費人力物力的手段來維持其不合理的生產關係；第二是由分配不均而起的勞資關係的不斷尖銳化，促進前一矛盾達到絕對無法調和的程度。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存在一天，這種矛盾是無法根本解決的。只有代表新生產力的勞動階級起來推翻代表舊生產關係的資本階級，才能最後解決這種矛盾。

所以社會主義的使命，不僅要解放勞動階級，而且要解放那種受資本主義束縛的生產力，使它無拘無束地發展起來，以滿足全體人民甚至全人類的要求

種意義來說，社會主義是無人可以反對的。假使中國能夠馬上實行社會主義，我想絕大多數人民也是不會反對的。

問題是在於中國目前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從生產方式來看）還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同時「要想生產，反而不能全用資本主義」（張先生語）。從表面上看，張先生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好像跟我頗不相同，因爲他似乎主張「跳了一級」，「從封建脫出，即跳入於社會主義」，我則主張要經過「新資本主義」的階段再走上社會主義。可是我細細地拜讀了張先生這兩篇文章之後，覺得在基本上他的意見跟我並沒有什麼不同，至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別。而這種差別的由來，大概一則由於我比較着重於最近的將來，張先生也許比較着重於稍遠的將來（這是相對的說法，希望張先生不要誤會）；二則由於彼此用語的區別或意義廣狹的不同。現在，我就趁這個機會再把自己的意見申述一番，以求教於張先生及一切讀者。

二十多年來，我對於中國政治有一個基本認識，認爲中國民主革命的徹底完成，必然要走上社會主義（在二十年前，我不止一次地發表過這樣的意見）。近五六年來，我對於中國經濟也有一個基本認識，認爲在推翻封建勢力以後，或長或短地要經過一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不能直接走上社會主義。前者表示我不相信兩次革命論，後者表示我不相信躐等說。這兩種認識，從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實際却正是「此時此地」的中國社會的「矛盾的統一」。

中國當前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其直接的目的在於推翻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壓迫，發展民族產業的資本主義。從歷史上看，一切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都不能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其發展程度越落後，越缺乏革命性。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當然也不能有例外。因此，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任務，主要便不能不落在勞動人民的身上。中國的勞動人民，包括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勞動者，倘若有力量完成這一革命，自然也就有力量保持並擴大這一革命的成果，逐漸引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不會再有第二次的革命。不然，就是民主革命的失敗。

可是在經濟上，情形就不一樣。中國的經濟本來已經落後，再加上八年抗戰和多年內戰的破壞，早已實行縮小再生產，連單純再生產也已不能維持了。在這種經濟基礎上，實在無法實行社會主義。我以爲要實行社會主義，第一、至少應當把主要的生產手段（第一是土地）收歸國有；第二、至少要使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取得領導的地位；第三、至少要使計劃經濟的力量能夠控制整個國民經濟領域；第四、至少要廢除基本的剝削關係和剝削階級。很明顯地，這幾點在最近的將來還是做不到的，因而也就不能有社會主義的經濟。

假定將來內戰結束，政權的性質（即階級基礎）起了變化，那時在經濟上第一件要做的事，恐怕還是整理和復興的工作，不是積極建設的工作。爲着整理並復興經濟，主要恐怕還只能做到下列各點：（一）全面改革土地制度，取

營事業的範圍，包括銀行、重工業、主要交通事業以及最基本的輕工業；（三）保護民族工商業，扶助農業和手工業的小生產，獎勵各種合作事業；（四）管理外滙和對外貿易，實行保護關稅和部份的計劃貿易；（五）制定進步的勞動法，普遍保護勞動人民，規定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禁止使用未滿十四歲的童工，限制女工及未滿十六歲的童工的工作，預防一切災害，增進勞工福利事業。在這範圍內的經濟，無疑地還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不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

三十年來，由於社會主義思想的傳佈以及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人們不知不覺地對於資本主義抱着若干不正確的了解（甚至還有先入爲主的成見），彷彿一談到資本主義就是罪不可恕似的。不僅有些社會主義者不斷在反對資本主義，甚至明明是資本家也不敢自承爲資本主義者（甚至不肯或不敢承認自己是資本家），倒反有人厚起臉皮自稱爲社會主義者的。這種情形跟某些法西斯主義者自稱爲民主主義者，某些帝國主義者自稱爲國際主義者（或世界主義者）一樣。這一方面固然是表示時代的趨勢，同時也是表示思想或觀念的混亂以及反動派的欺騙。我之不肯輕易使用社會主義這一術語，並非我對於社會主義的前途有何懷疑，乃是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解和流弊。

許多人一談到資本主義，差不多都以英美爲模型（十九世紀以前的英國和二十世紀的美國都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彷彿像它們那樣才算得道地的資本主義。殊不知資本主義不僅有若干階段，而且有若干類型。中國今後可能發展的資本主義，不僅是一個特殊階段，而且是一個特殊類型。它是生根於中國的特殊的具體的歷史基礎上，並產生於當前特殊的國際環境中的，既不同於過去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完全同於今天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必須先了解了這一點，然後對於我所說的新資本主義才不會發生誤會。

我用新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來表示今後中國的經濟，也許不很恰當，同樣可以發生誤解和流弊。這一點我是考慮到的，但我仍舊使用這一名詞，也有我的理由：第一、在最近的將來，爲着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我們還要儘量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種種優點，在一定範圍內的追求利潤和合理競爭，講求效率和計算成本，以及由此而生的技術進步和管理改善，都是我們所要保存的優點；第二、在生產過程裏特別在流通過程裏，今後中國的經濟還要受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的支配（至少在基本上），我們只能從認識這種法則中去指導或調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它有利地走向社會主義；第三、在這一時期，不僅在經濟上有不斷的鬥爭（機器生產與手工生產的鬥爭，集體勞動與個體勞動的鬥爭，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鬥爭等），尤其在政治上更要有不斷的鬥爭，始能保證這種經濟的發展可以走向社會主義，免得人們因誤認社會主義已經到來而懈怠了自己應有的努力。簡單說，我之所以使用新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因爲我認爲這種經濟在本質上還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不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

自然，我所說的新資本主義經濟，也可以說是一種帶着混合性的過渡形態。這種形態，只有在勞動人民掌握或領導政權的時候才能實現，因而也可以說是一種保證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形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是有矛盾的，但是在一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之下，這種矛盾是可以調和的、統一的。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必然要以非剝削的或受剝削的勞動人民為主體，因而也就以代表他們的利益為主要目的。可是新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僅容許剝削關係的存在，而且還獎勵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也就要擴大剝削關係——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這種從表面上看來的矛盾，在實際上却得到了合理的解決，就是在消極方面，以改善分配關係的方法去限制剝削，在積極方面由提高社會的生產力而增加全社會的財富和勞動人民所得的分配額。這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資本主義的經濟中容許剝削關係存在的理由。在目前，我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及其附屬的買辦資本）和封建地主的剝削而不根本反對民族資本主義的剝削，也就是為此。只要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還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作用，我們就應加以利用，不可無條件地反對。一切自由、平等的理想，都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有實現的可能。廢除剝削，必須以增加生產為前提。

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情形跟我們完全兩樣。在那些國家，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早已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能容納的了，而剝削關係的存在却只有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在那些國家，只有趕快根本廢除剝削制度，才能迅速增加生產。可是像我們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便不能像他們那樣根本廢除剝削制度。為着增加生產，不能馬上廢除剝削，這是我們落後國家的不幸。

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其最大的弊害，第一是過份剝削勞動階級，使他們長期屈服於資本階級的支配之下（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第二是資本家的生產只曉得「唯利是圖」，造成人力上和物力上的無限浪費；第三是資本階級獨佔全部剩餘價值，不斷增加其剝削力量和生活享受。我所說的要矯正資本主義的弊害，主要也就是指這些弊害。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之下，也必然要矯正這些弊害，而且一定能大刀闊斧地矯正這些弊害。張東蓀先生所謂「不能全用資本主義，大概是指此而言。

在新資本主義的經濟裏，剝削關係雖然存在，但在兩方面要受到限制：第一在勞資的分配關係上要受到限制，對於勞動者的生活要有最低的保障，不許資本家有過份的剝削行為；第二在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的使用上要受到限制，獎勵他投資於擴大再生產，不許他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有過份的享受。當國家規定一切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和社會政策的時候，都要注意到這兩點。此外，在整個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裏，也應當而且可能適應當時當地的實際情形而給予各種必要的限制，但決不能根本廢除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同時，在新資本主義的經濟裏，不但不排斥，而且還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去積極創設並扶助某些帶有社會主義性的經濟形態的成長，但它們在初期也還要受着資本主義的基本運動法則的支配，在某一定的發展階段也還要受着這些法則的影響，直到它們有能力領導並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域為止。我把某種從量到質的變化沒有到來以前的經濟情態叫作新資本主義經濟而不叫作社會主義經濟，這也是一個重要理由。

在這裏，我想舉一個明顯的例子：現在英國雖然已由工黨執政，正在施行着若干國營或社會化的政策，但嚴格地說來，決不能稱它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它的經濟也還不能叫作社會主義的經濟。再以東歐各國為例，它們的政治雖然已經完全由共產黨領導或控制，但其經濟也一樣還不能稱作社會主義的經濟（雖然其政治已足以保證它走向社會主義）。我這種說法，雖然跟張先生有些不同，但在基本的意思上，我想決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根據以上的種種說明，我想作一個簡單的結論如下：當某種剝削關係還有增加生產的進步作用的時候，我們便應當充分加以利用，不可輕言廢除；當某種剝削關係不但不能增加生產，反而妨礙生產的時候，我們便應主張根本廢除。因此，為着增加生產，我們主張保護資本主義性的民族工商業，取消封建性的土地剝削和官僚資本的剝削以及一切帝國主義的剝削。

卅七、三、六。

總統的災難

（紐約通信）

楊剛

一

差不多兩年以前，杜魯門總統曾經走過一段鴻運。那正是外長會議第一次在莫斯科舉行以後。會議的結果首先觸怒了白宮最高顧問李海海軍上將。次之得罪了范登堡，達勒士等諸大領袖。報紙從華爾街日報到所謂理智性的紐約時報都聲討美國的軟弱外交，認為柏恩斯在莫斯科做了瘟生，總統簡直是個小人物。那時候的總統，情形相當悲慘。報紙上時常把他老人家拿來開玩笑。他們說總統躲在白宮裏對親信抱怨，自己原來沒有要當總統，也不喜歡總統這個差使，並且說他私下發誓，下一屆硬是不幹了。

兩年之後的今天。雖然我們沒聽見總統眞的不肯幹，而且直到他去加里賓海散心之前，大家還在報告總統野心勃勃，可是華盛頓的風聲却越來越緊。民主黨的黨老闆們以為今年恐不能叫杜魯門連任，打算拖艾森豪威爾上台。并且也不和遠在海上的杜先生商量，就替他宣佈說，以他對黨的忠忱，叫他不幹，他當然就是不幹。這些專門闖別人殘忍的美國老爺們做起事來，也眞夠鐵面無情的了。據

[illegible]

好話，右邊做好事的計策，弄得他一帆風順，與致勃勃，非幹不可的呢？現在，到了左右夾攻，大選在卽的時候，就來這一手。無怪總統要去海上賞風月，無怪誰也不寫社論逼他回來。

不過，看夠了私利政治的花樣，使人無心去管他們的政治道德。事實上，這些老爺們之看待選舉這件大事與對待棒球競賽無異，說不上有什麼政治原則和政治道德可以遵循。今天這個角色能叫座，就把他大捧特捧，明天他讓人家喝了倒彩，就趕緊另找明星。對於那個倒了彩或有倒彩之危的角色，實無加以客氣之必要。這個比喻亦非說杜魯門先生已經倒了彩。今天的總統還是像拳技場上挨了對手一揍的那個拳師。他是爬在地上了，嘴裏說着，「我從來沒有宣佈要競選哪。」可是，技場上那個照顧打架的人卻還是在對他揮手舞脚，要鼓起他來再顯顯本事。用意是在從現在起到七月民主黨大會推選總統候選人時爲止的這段時間內，看看總統的時價如何。

二

事實的經過大家或許已經相當明白。總統的敗運從去年年末轉入今年年初，禍根自然是華萊士的第三黨。從那時候起，接二連三遭遇了不順心的事。

第一，在紐約國會第二十四選區（紐約市布郎區之一）下院補選議員競賽中，第三黨旗開得勝。它的候選人所得選票超於其他三個黨候選人所得票數的總和。第二十四區本是民主黨最有把握的老巢，從來沒經任何政黨搶去過。這一次競選，本已感覺到第三黨聲勢洶洶，特爲動員自已的幹部四出找自已的老牌選民去投票。誰知選民到了票櫃裏，把第三黨候選人的名字寫在票上就走了。結果登在報上，黨魁大爲喪氣，就罵手下人不拉選民。可是手下人說：「我們把他們都拉出來了，但是他們選舉反對我們啊」。

這件事在旁觀者看來或者沒什麼了不起，但是在美國人方面卻是大震動。對他們還有三個意義，(一)紐約州在總統大選上佔着最重要的策略地位。因爲實際產生總統的選舉院（此地總統是雙重選舉產生。一面是人民普選，普選後由各州選舉院再投票決定下屆總統。）在紐約州共四十七個，其次最多的加里福尼亞也只有二十幾個。全國選舉院總數五百幾十人。因此，紐約選舉院的多數很要緊。紐約州，尤其是北部，向來是共和黨的力量，民主黨的勢力主要在於紐約市，特別是紐約市左翼工人。第二十四[illegible]了民主黨和杜魯門。趨勢說明在十一月初大選時，對於紐約選舉院中的多數民主黨極少希望。(二)華萊士的影響主要是在工業性的各州。工業重點的紐約一舉一動常爲全國的風標。華萊士這次的勝利，對於第三黨主觀上是莫大的鼓勵。對於其他工業州的人民，客觀上是一個風向。(三)假如可以把第二十四區選舉結果當作風標看，當權黨是把人民意向與政府政策中間的距離看得太小了。究竟這三點的現實性如何，我們不需斷定。問題是他們有了這種看法以後，民主黨黨魁們私下計較以爲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要華萊士洗手歸隊，說只要你回來，別的事全好商量。此計現在行不通，華萊士不幹。

第二，反華萊士的右翼自由主義者，美國人民主行動會的態度沒有把握。這個團體在去年春間組織起來，與美國進步公民會（現在第三黨的核心）對抗，批評政府內政而擁護其外交政策。到去年冬初起，連外交政策也批評一下（如對杜魯門主義）。年前第三黨聲望加重，民主行動會相形見拙。上月該會舉行全國代表大會，一方面痛責第三黨和華萊士，另方面卻不敢支持民主黨和杜魯門。主要的原因是下層代表反對這樣做。尤其是學校裏的學生代表們以爲要如此，他們就無法在學生羣衆裏做宣傳工作，無法反對第三黨在學校的力量。工會首領方面也有同樣意見。他們說，這樣的總統叫我們怎樣要工人去擁護他？「你不能夠拿糊塗蟲和有實力者作戰。You Can Not Fight some body with Nobody.

就民主行動會說，它本身眼前還不是一個力量。它的威信在於它有一些上層人物如羅斯福夫人等，但是下層工夫則還在開始時期。它之號稱爲不行動派，對於講行動，惡坐談的美國人脾胃不合。這些是它的弱點。它也有它的強處。自進步公民會宣佈第三黨運動，華萊士宣佈競選後，工業團體大會內部的分裂跟着政府取締共產黨人的步驟而表面化。左翼工會站在華萊士一邊，右翼則反華萊士。政治上他們大致是想支持民主黨和杜魯門，但又不敢顯然做出來。因此變成了無所屬而與民主行動會慢慢到了一起。工業團體大會的右翼現在包括鋼鐵總工會、煤油總工會、汽車總工會、海員總會的一部份。這些重工業工會當然增加民主行動會的聲勢，使他們的壓力加強。但是正因如此，民主行動會的內部反而漸漸生長了不調和。因爲下層傾左，上層傾右。卽在上述右翼工會之中也是如此，工頭傾右而工人傾左，所以工頭到了民主行動會中也不能完全和行動會的上層人物一條心腸。

[illegible]沒有把握，卽就行動會本身來說，也還在恍惚不定的時期。他們的遠景不明，近狀也不確定。尤其關於後一點，是他們與第三黨方面截然兩樣的地方。關於遠景，由於成份複雜（包括會員和同情者），其中有人頗信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如前物價局長鮑爾斯。有人據說是社會民主黨，如下午報總編輯列雷(Max Lerner)。有人傳稱爲托洛斯基派，如汽車總工會會長魯特(Walter Reuther)。到現在爲止，我們沒見行動會就遠景方面發表什麼意見和政策。關於近勢，除了極端反對華萊士以外，找不到他們積極的做法。原因與其說是因爲對杜魯門失望，還不如說是由於第三黨在短時期內的成就使他們感到了前途的憂懼。我們早已說過，組織第三黨的要求在許多自由主義者和一部份工業大會的右翼領袖中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實望能夠做一個第三黨領袖的眼前可只有華萊士。問題是這個第三黨及其領袖華萊士將與左翼合作，還是成爲右翼的陣營。華萊士反對備戰的國際政策，反對意在恢復歐洲資本主義的馬歇爾方案，正好和右翼的主張相反。結果第三黨的優先權到了左翼方面。第三黨運動宣佈了之後，不但未遭衆[illegible]，而且進步極快，已經奪出了紐約第二十四區競選勝利的成績。瞻望前途，卽使今年該黨選不出總統，而在未來四年中，萬一恐慌爆發，則一九五二大有可能使第三黨變成第一黨。假如華萊士及第三黨在那時以前不能被右翼弄過來，則那個前途是右翼所不願的。因此他們的問題是如何弄垮第三黨，然後他們好來再搞一個。

在這裏，行動會策略上出了幾個問題：(一)拼全力把民主黨爭到自已這方面來，還是(二)不管民主黨本身，只求其換一個有發動性的人代替杜魯門競選，還是(三)容讓杜魯門，但壓迫他左轉。利用第三黨的威脅，他們可以向民主黨討價錢。對於華萊士，則冷藏失效，轉入進攻。紐約州的工人政治行動委員會已經下了這道命令。但是對於上述三個問題他們似乎還是不能決定。第一個根本辦不到。第二個右翼主張甚力，且主張推艾森豪威爾。第三個民主行動會長將認爲還是可以做。結果大會決議案出來，除了罵第三黨是鮮明火烈之外，對於民主黨和杜魯門是否擁護，只是不響，總要俟七日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出來了再說。關於國際政策和平問題依然不能簡單明瞭的講話，結果是從莫斯科到華盛頓通罵了一陣。

行動會這種恍惚的態度，好處在於使民主黨受到消極的壓力。在北部諸州已經遭受第三黨猛烈攻勢的民主黨，無論如何禁不起行動會再來拆台。

第三，為了應付華萊士的攻勢，總統在過去兩個月中拚命向左看。要找出幾件事來做做。可是國際政策不肯變，勞工政策不敢動（塔虎脫勞動法案），控制物價不宜說。環顧之下，只有針對南方的民權法案既是北方人所愛聽，又可以大收黑人的心腸，通一下就把它提出來了。在總統及其策士的心理上，南方民主黨人出不起多大花樣。而連羅斯福都不敢換的民權法案，杜魯門能提出來，北方選民還能不認為總統是大自由主義者，把選票送給他？

這件聰明事沒有產生預期的好效果。工大的右翼和民主行動會一部份人至今還是在暗中進行倒杜。工大會長麥雷（也是鋼鐵總工會長）正在要和艾森豪威爾談話，探他對競選的口氣。一般工人天天給麥雷電報反對擁杜，第三黨方面更是置之不理。原因是在美國當前的重大問題之中，關於黑人的民權法案恰恰是最無時間性、最片面、最無實際性的問題。該法案即使成立，南方黑人也不會馬上得到好處，正如北方黑人實際上地位和南方的距離不遠。

可是它帶來的災禍却促進了總統的低潮。南方民主黨的反抗大家都知道了。他們始而向總統抗議，繼而要求撤回提案。最後拿出了大法寶，安排破壞杜魯門被選的一切可能。

南方也有深謀遠慮的人物，因為智力是遍在的，只有不同的利益造成它的分歧。我們早已說過，華萊士這次舉動是美國政治上一件大事，它有非常大的政略意義。目標是要用代表階層利益的黨派對立來代替代表人事關係的黨派對立。這意義的初步表現，就是上述諸種情勢的結論。民主黨及其週圍的一些工會和自由主義者好像是一潭水。第三黨這塊大石一投下去，所有的沉澱和蟲豸全衝上來了。全要找新的伙伴，新的棲身之所。民主行動會及工會的表現是如此，西部民主黨的醞釀也是如此。而南方民主黨領袖顯然的叛變尤其是深遠的說明。這樣的形勢，或者使讀者會覺得總統望左說好話的政策糊塗可笑。但即使我當這個總統，拖到如此地步，我也不知除此之外能幹什麼。形格勢禁，積重難返，杜魯門是偉大時代一個不相稱的悲劇。這個政權的軟弱性實表徵美國式的民主政治接近了它內涵的重要的危機：以不同階層利益為基礎的政權爭奪將代替以人望為號召的政權爭奪。美國政治上，心理上，表面的大同時代將要過去。第三黨運動之所以有上述那個目標，應該視為這危機之初度表面化。

南方領袖對於第三黨當然不是如此看法。這是由於閉塞，不是由於愚蠢。反之他們已隱約感到這一點。第三黨運動對於他們的深遠影響，他們很懂得。第一他們不能忽視未來四五年中，大恐慌有爆發的可能，華萊士在一九五二的機會是一個實際問題。第二民主行動會，包括工會的表現，使他們感到北方民主黨人離心力強大。第三假如華萊士的政治分化策略成功，保守力集中共和黨，進步力集中第三黨，民主黨變成僅僅以南方地方利益為中心的小集團，則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特殊利益就會一去而不復返。

南方領袖們的大法寶是在這樣一種考慮之下形成的。它的內容是由州國會定一法律，決定該州選舉院的代表在總統決選時可以不投本黨總統候選人的票。如此則南方民主黨可以隨意與共和黨或民主黨總機關討價還價，然後決定使那邊上台。南方十一州共有一二七名選舉院的代表。全部選舉院代表總數是五百卅餘名。假如十一州都行此辦法，杜魯門總統即使能拿到多數的普選票，也難聯任。再推到一九五二，假如第三黨總統候選人勝利，則同樣辦法可用以不許那人當總統，其勢將造成共和黨與南方民主黨聯合選舉的總統上台。如此特殊利益才有保障。這法律佛吉尼亞已經通過。美國人認為其他十州也會仿行。

這一手相當辣。但從大方向講，依然不出第三黨政治目標的範圍。保守勢力在選擇自己的同盟軍，以抵抗將來的惡運。從我們局外人看來，南方的反攻在將來的天秤上不過是掙扎而已。因為即使是共和黨也不敢站在「白人至上」的旗幟底下。而且他們的利益早已超過了那範圍。

可是在眼前，這一手却是民主黨競選的當頭棒。

三

總統同來了。民主黨總機關不再說叫他走他就得走的話。民主行動會和工會還是在商量抓艾森豪威爾出台。南方在反叛。這正是民主黨首腦部在大費腦筋的時期。

假如說，對於杜先生他們還有絲毫希望，那就在於戰敗南方。因為他們知道南方的旗子已經是一塊爛布，拿着它也舞不起幾多人。但北方的旗子—和平、進步、繁榮—却是鮮紅有力的在風勢裏面。總得扯起一張和它差不多的旗子擋在它前面，然後再和南方講講交情，總不至於十一州全叛過去。北方旗子下那堆人是不講交情的。所以他們正在對總統做種種手勢，勸他再向南衝。衝得好，總統解放了南方的黑人。不好，也不過如此，反正是糟。這是正面。

其次，另打主意。一些無線電廣播員在報告民意測驗的數目字。艾森豪威爾第一，華萊士第二。杜魯門老是人民心目中第五六名的總統。還有人說亨利魯斯所編的幸福雜誌也為此舉了一次測驗。結果華萊士得票一千二百餘為第一，連艾森豪威爾都只有幾百張票。該編輯用種種方法替華萊士打折扣，得票實九百，還是第一。所以該雜誌認為這測驗不對，把它丟了。這一切都使民主黨機關在做手勢之餘，還要進行拉伕。他們可能拉者，第一艾森豪威爾，第二前物價局長鮑爾斯，第三最高法院法官陶格拉斯。第一位是工大方面所屬望，但民主行動會中有人却怕軍人頭腦掌了國家大政，不是被大有力者牽鼻子，就是自己闖禍。第二位是民主行動會所屬望，工大方面也感情很好。但他是新出場的人物（鮑爾斯在戰後物價管理局時，為物價控制出過大力。他完全以此聞名），聲望方面顯然不如艾森豪威爾，那是風靡全國的明星。第三位是老政客但是對於後生小伙子們並無太大吸引力。對於這些人的考慮、衡量、和試探正在進行。這是底面。

或者，在全世界範圍內，美國此時在某一方面能夠宣佈得到了完全、徹底的勝利，比如說把中國共產黨消滅了之類，杜總統的聲望能夠上去一些吧。否則，從現在到七月，眞是漫漫長夜。

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　紐約

美國對華政策的冒險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25, 1948

Nathaniel Peffer

中國內戰業已正式打了十八個月，雖然至今尚無決定性的結果，有一件事却可以確定說的，那就是共產黨雖沒有戰勝，南京國民黨政府確已戰敗了。換句話說，南京政府已經失去了戰勝的機會，共產黨或許尚有可能。南京政府至多能做的是把握住凡是屬於它自己的，雖然即使是這個能力也一天比一天令人懷疑。所以在遠東史上正展開了

衝突，它尤其是危險。

除開發動內戰的南京政府的軍事領袖以外，大家都預料到內戰的不能有決定性的結果。很多在中國的美國軍事代表，早曾在一九四六年警告政府最高當局以武力消滅共產黨的不可能，政府儘可以打幾個勝仗，共產黨很容易會回擊過來的，就這樣不斷重複，直至軍隊精疲力竭以及國家在經濟上瀕於破壞爲止。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政府在打了幾次形式上的勝仗以後，尤其是張家口和延安的先後克復，頗使它陷於過分的自信。

縱令對於南京政府抱最懷疑態度的人士，恐亦沒有預想到今天實際上發生的情形，因爲大家都一向假定任何一方不能打一個明確的勝仗，其結果便可能是僵局，南京政府儘管在形式上打勝仗，其實力將因消耗而變弱，漸漸地雙方感覺繼續作戰的毫無意義，乃重新打開妥協與和談之門。沒有人，或許竟然包括共產黨在內，會想到共產黨的積極戰果，在經歷了十八個月的時光，它幾乎控制了東北的全部和華北的一大部份，它的實力竟繼續在加強，並且在一九四七年年底，南京政府所控制的區域竟然在趨向崩潰，而其生存也是朝不保暮。雖然如此，這正是實際上發生的情形。

原因究竟在那裏呢？大體上說，南京政府的內在弱點實大於一般對它的認識，戰爭的考驗更把這點弱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政府雖擁有龐大的美式配備的軍隊，但在笨拙的正面襲擊中浪費了不少兵力和配備，它克復了地方，却沒有擊斃多少共產黨軍隊。相反的，共產黨儘管放棄了城鎮，其犧牲却遠不如政府軍隊之大；政府不但在策略上錯誤，而且在軍事指揮的技術上也呈現欠缺和無能。同時，大部份的政府將領都是政治將領，他們連西方三等國家的軍隊都不夠資格指揮，反之共產黨的軍事領袖們儘管在其他方面可被指摘，在軍事上都是勝任愉快的，他們中間大部份都是在抗日的游擊戰中鍛練出來的。此外，相當部份的國民黨高級軍官既貪污又無能，對於剋扣軍費的重視甚於作戰，反之共產黨高級軍官却是誠實的，也儘管在其他方面可被指摘。

部份的基於以上所說的原因，共產黨軍隊具有振奮的士氣作戰，國民黨軍隊則士氣沮喪。由於被棄擲並不得一能，國民黨軍隊無心作戰，不必要地整批的撤退或投降。這可以說是目前南京政府的最大弱點，它的軍隊無疑在感到彈藥的短缺，因爲彈藥都被無謂的消耗了，而尤其嚴重的，它是靠着充滿不滿心理的軍隊在作戰，或者至少它的軍隊對於爲何要作戰的目的根本就不發生興趣。它的新兵徵調生手一般被編入隊伍，也可能覺不得一飽，他們爲甚麼要作戰呢？共產黨固然也徵兵，但它給他們喫飽，並灌輸他們政治教育，這政治教育或許是歪曲的，但他們因而知道些爲何作戰的原因和理由。至於普通人民方面，情形亦復相同。中國人民的大眾厭惡內戰，並對參加內戰的雙方都表不滿，但是共產黨每到一地方，總設法來緩和至少是一部人民的不滿情緒，而國民黨所遭遇到的却是唾棄的日益加強。在共產黨所控制的區域內，至少有一部份人尙存有希望，而在國民黨所控制的區域內，沒有人再看到一線希望的曙光。

最後，國民黨區域的經濟已趨於全面的崩潰，政府破產，幣制貶值，經濟生活的正常步驟已逐漸到達癱瘓狀態。在這方面，共產黨比較要幾倖些，它的力量在鄉村，而由於農民總是生產自己的糧食，大體上可以自給自足，並不受貨幣經濟的影響，所以共產黨是不會感受到通貨膨脹的威脅的。但是國民黨的力量仍在都市，都市負擔了政府行政的支出；假若幣制貶值，銀行便不能不倒閉，公務人員的待遇無法改善，外借也無以償還，政權本身立刻會受到致命的打擊。國民黨區域雖尙未惡化到這個地步，但也距離得不遠了。

就目前的狀況看，時間對於南京政府是不利的。政府力量的根源已漸枯竭，它無從獲取復興的資源，它的將領不能超越他們的本質，它的軍隊仍將是一班被迫徵來的壯丁，它並將自一般不忠誠的人民中去覓求道義上的支持。共產黨的力量很難加以估計，但很明顯的，它決無能力實際控制全國，因爲無論在人力或物資方面皆嫌不足，而且除非獲有蘇聯的援助，它之能否贏得足夠中國人民的積極支持，亦難斷言，何況它亦不願這樣做，因爲它並不希望中國內戰會擴演而成世界大戰。

所能預測的乃內戰的繼續，它是痙攣性的，雜亂散漫、的，國民黨軍隊或能因兵力的突然集中而打幾個勝仗，並向美國輿論吹噓，但是過了幾個月，在同一地帶又發生惡戰，而且結果共產黨的力量一定會莫名其妙地比國民黨勝利前更爲強大。南京政府可能漸趨衰弱，起初不大爲人注意，漸漸大家都能看到。要是沒有外來的干涉，城市中心的幣制與經濟的全部崩潰，勢難避免；擬議中的六千萬美元借款最多僅足夠償付進口貨物，它拯救不了國內的經濟。政府爲了要打內戰，必須支出龐大款項，而這龐大款項當然不能完全依賴租稅，乃不能不濫發紙幣，而使情況更爲惡化，對於這，六千萬美元是無濟於事的。所以結果便很難想像了，最可能或許是割據局面的形成，南京政府控制其附近的區域，共產黨控制整個華北，或不包括類似天津較大的半現代化都市，其他有些區域處於地方半軍事自治的情形之下，既不受國共兩方的節制，亦不完全獨立。這就是說，不易得來的對日勝利的後果將全被犧牲，除掉從日本手中解脫出來以外，中國人民的痛苦都將自受了，國家也將像從前一樣，柔弱而無救。這種情形，不止對於美國，且將對於全世界產生重要的後果。假若內戰能夠限制於中國的國境範圍以內，或不甚於美蘇分裂的問題，它或不至過於危險，但是它無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確是承襲了西方衝突的典型，要使它與更大的衝突相隔離，實爲不可能之事。

一直到共產黨形式上佔領了全中國或中國的大部份，並一如波蘭與南斯拉夫那樣參加了蘇維埃集團，那個時候才會有眞正的考驗，這個考驗的尖銳程度將視美國援助國民黨來阻擋那種發展的情形而定。國會立法以及輿論壓力都顯示美國正在考慮這樣做，現在的問題已不再是要不要支持南京政府，而是幫助它多少以及如何幫助它。這並非因爲對於南京政府的重視，更非任何保證，過去馬歇爾、魏德邁、或新聞通訊員的意見，都不是對於南京政府存何妄想，直截了當地說，他們的目的純在不使共產黨獲勝，從而不使蘇聯得能控制中國。

這裏便引起了兩個問題：第一，**美國所採取的方案**，是否爲達到這個目的所必要？第二，**美國所採取的方案**，是否一定有效果？

第一個問題殊難肯定加以回答。雖然共產黨未必會佔領全中國，但這亦並非不可能；假若南京政府所可控制的範圍被削斷或僅限於國都附近的區域，這是可能會有的結果，那便無疑有了一個眞空地帶，共產黨隨時可以衝入，除非地方武力把它拉住。到了那個時候，蘇聯自發地進入來建立一個合併於蘇維埃集團的共產黨政權的情事，似乎不至發生，亦無必要。那麼，中國共產黨會不會有這個要求呢？這個問題在目前是不能回答的。假若美蘇間的裂痕並不大，同時美國也並不過於援助南京政府，很可能的，共產黨將堅持其自由行動，並將對蘇維持善意的中立，它決不至再有其他作爲。但假若全世界在思想問題上必須有所選擇，同時美國也根據目前的方案極力支持南京政府，我們敢預卜共產黨一定不顧一切代價去乞求並接受蘇聯的支持，因爲它除掉聽任被消滅以外，別無其他的選擇。是則干涉反而帶來了它所要預防發生的結果。

第二個問題比較重要：照現在的情形援助南京政府，

是否會有效果？凡是認識當前中國的人，誰都不會相信。南京政府的弱點不僅是或主要是錢的問題，一年前能把南京扶持起來的改革計劃，在目前也全都用不着了。國民政府要想擊敗共產黨，進而消滅它或驅逐它，下面兩件事情中的一件是必要的：或由美國遣派至中國裝備最近代化的至少十五萬大軍，包括一支強大空軍，或由美國直接指揮國民政府的軍事與行政組織。前者當爲南京政府所能接受，而要它讓出對於軍事與行政機構（包括由於後者的財政上的好處）的控制權，乃爲瞭解南京政府的心情者所不可想像。

除此以外，別無能發生作用者。錢對於南京僅有極小的幫助，即使不因沒有效率或投機而被浪費，它至多暫時制止了通貨的膨脹；要使國民黨重新具有償付能力需要很多億美元，要進行內戰更需要很多億美元，而如何建立一個足能擊敗共產黨的軍隊的問題依舊存在，這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除非把全權交與美國人。很不幸，中國的內戰業已發展到這個地步，祇有美國的全面控制中國，才能阻止共產黨對於一部份中國的控制，或恢復國民政府對於全中國的控制。

對於美國，這是一個不愉快的選擇。無論蘇聯直接或間接在中國佔有優越地位，將發生不良的可能情事，還是顯而易見的；直到現在的美國方案，其目的在不使此種可能情事發生，但都不能發生作用，卻反而促成此種可能情事的發生，因爲它們不但不能阻止蘇聯，反將使令蘇聯加入，或至少迫使中國共產黨投到蘇聯的懷抱中去。

所以美國的真正選擇是：或則派遣一大支遠征軍來消滅中國共產黨；或則靜待事態之自然演變，一俟蘇聯進入中國時再決定行動。美國派遣遠征軍至中國來對付共產黨以後，是否因此會使蘇聯採取報復手段，這僅是一個修辭的問題。因此在邏輯上，美國的真正選擇祇是：或則在遠東向蘇聯正式並不可挽回地挑戰，而甘冒戰爭的危險，或則靜待事態之自然演變。這裏便引起了一個戰略上的問題，這就是說，爲要挑戰起見，中國是不是一個最合適有利的地區。很少對於當前中國具有真正認識者，他們的回答是正面的。

中國在二次大戰後的厄運，不僅對於中國是一個災殃，係在一九三七年以前一樣，中國依舊是世界大戰的一個戰場，並且比以前更直接地把美國牽連在內。美國因而所遭遇的危險之大，實無庸諱言。它現正採取各種不可改變的步驟，在無意中必將招致戰爭，然而當它決定採取這些步驟的時候，卻從沒有考慮到它們將引導它進入那一個方向，以及美國此刻究竟要不要走上那個方向。

總結起來說，爲美國所開的兩條路，一條路是不干涉，另一條路是支持南京政府，任何一條路都是不合適的。如果決定不干涉，則有共產黨控制全中國，並像東歐那樣成爲莫斯科之衛星的危險，雖然這或不至如此，但可能性還是存在着，而果真實現時，美國在大陸兩岸的安全將受到威脅。如果決定干涉，則除非干涉到一個程度，蘇聯勢非加入，並造成類似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的情形，否則將爲徒然。國民黨單獨，或縱令有美國的支持，決阻擋不了蘇聯；假定蘇聯決心加入了（這是很難斷定之事），在目前的情形，祇有美國軍隊才能阻擋得了它。

由是觀之，一條路是危險的，另一條路是徒然的，而使選擇幾乎成爲機械的。但倘若選擇了靜待事態在中國自然演變的態度，很可能內戰的雙方終久會陷於精疲力竭，美國又可以進而加以調停，並予新政府以物質上的援助，這新政府爲各黨派的代表所組成，最好大部份是中間份子，一方面不像國民黨那樣腐敗，另一方面又不像共產黨那樣難足憑信。在任何情形之下，美國得能自由行動，當遠東爆發危機的時候，它可以自由選擇如何行動，不受國民黨的負担的影響。這雖是在遠東的十年鬥爭的悲慘的[illegible]，但實際的情形就是如此。

（本刊特約譯者譯）

關於「鄉土工業」和「紳權」

費孝通

安平兄：謝謝你來信要我寫一篇有關城鄉關係的論文給「觀察」，因爲你告訴我，近來有些讀者對我以往發表的言論有很多疑問。我最近在「中國建設」發表了一封給姜慶湘先生的信，曾答覆過一些問題，「觀察」能給我一個機會再補充若干意見，我是十分感激的。讓我先說，我對於這問題是極有興趣的，這一年來，我在「觀察」和大公報寫過若干有關的短篇，目的就在引起讀者的討論，一切的批評，即使帶一點誤會或攻擊，都願意虛心接受，因爲最知道自己思想沒有成熟和見聞不夠周到的應當是我自己。當然我也希望批判者能多偏重於問題本身。

我認爲城鄉在經濟上及政治上都有相成相剋的兩方面，在歷史的演變中，雙方的分量常有輕重的變化。各人因爲見聞難能周全，所作估計也因之可能有偏重之處。我希望的就在多讓各種看法儘量發表，然後共同來做一篇綜合的總結，結果我想必然能更完全些。這是我給姜慶湘先生的信上已提到過的。

我在已發表過的文章中曾提出下面的看法，究竟對不對，很願意讀者給我指教的。

在傳統經濟中，中國的城鄉關係不盡是工農的關係。在鄉間有很發達的鄉土工業，鄉民的日用品大部是自給。因之我曾要知道在經濟上鄉村在那些方面依賴都市的供給？如果出多入少，則我們可以說城市和鄉村主要的經濟關係不在貨物的交換上，而在根據於地租的片面供奉上。

我和這裏的朋友們也討論過這問題。後來我們覺得應當把傳統工業分成三大部分：一是皇家獨占的工業，二是供給有閑的官僚地主享用，以及小市民間互相交換的市鎮工業，三是鄉民在家庭及作場中所經營的鄉土工業。皇家獨占性的工業由來已久，鹽鐵、軍備、貨幣、以及重大的工程，大體上說一直是由皇家包辦的。皇家可以用奴隸、囚徒、以及民間徵來的勞力經營這些工業，或是由大商承辦，普通人民很少有機會染指。這也許就是中國工業不易發達的一個重要因素。最近王亞南先生在「時與文」上提到過這意見，很和此間朋友的看法相合。皇家工業和鄉村的關係，又可從兩方面看。在原料和勞力方面如果有須取給於鄉村的時候，是徵發來的，即使名義上給與報酬，經過官僚之手，也就很可能化爲烏有。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問：皇家工業的出品有多少進入鄉村的呢？大部分的皇家工業是爲政府所需的消費而設立的，如軍備和貨幣；也有專門製造各種宮庭的奢侈品；無論那一種人民都是沒有分的。進入鄉村的是鹽鐵等必需品。在專賣制度下，這些東西有類於賦稅性質，是國庫的收入。在經濟上看，皇家工業和鄉村的關係可以說是片面的。

這種工業究竟占中國傳統城市工業中多少部分？這問題是值得我們研究的。鞠清遠的「唐宋官私工業」一書中曾說過，在唐代從事於官工業的人數「已約佔全戶口之二

……手藝未發達。但是匠為皇家所需的器材和貨物大部由官工業自行製造的緣故，數目上不能太少。

其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城市居民所需日用品的來源，和市鎮工業品的市場。在閉關時代，城市裏所用的工業品（加過工的製造品）有多少是從鄉村裏來的？反過來問，市鎮工業的製造品有多少是用來供給鄉村人民的消費的？這些問題其實是我們所要討論城鄉經濟關係的關鍵。

市鎮本是工業的據點。我以前曾說中國工業主要是鄉土工業，經朋友們批評之後，我覺得這句話是有毛病的。我說那句話時，心目中並沒有顧到市民羣的消費，祇就鄉村說，鄉民所用工商品曾有過高度自給的情形。我忽視了市鎮工業，那確是應當矯正的。鄉村供給市鎮的大部是原料和半製造品，糧食、紗布、蔬菜、絲綢等等；市鎮同時吸收皇家工業鹽鐵等原料，而自行製造各種消費品，所以在市鎮中有着專門從事製造業的工匠。

市鎮的工匠可以分出兩種性質，一種是出賣技術的，一種是出賣製造品的。同一工匠也可以兼有兩種性質。市鎮裏的大戶人家，就是在二三十年前還是如此，自己預備了原料，僱工匠到自己家裏製造所需的日用品：裁縫在家裏縫衣，木匠在家裏造器具（尤其是嫁粧之類大批的木器），甚至過年時的年糕也請了師傅在家裏蒸的。工資依時間計算。一個工匠常有一定的長期僱主，世代相承。這些工匠無需自辦作坊，無需資本。這種方式也可以說是封建性的。

有足夠資本的工匠可以同時經營作坊，替僱主製造定貨，原料時常是由僱主自備，按件付工資。在目前很多裁縫鋪還是這種性質。以上兩種方式的城鎮工業都是靠市民支持的，雖則工匠們也偶然下鄉，大的如造屋的木匠，小的像剃頭，修理農具等工匠則按村巡行，零星找僱主。這種以技術去服務鄉民的工匠在數量上是不多的。

還有一種是出賣製造品的工匠，在鐵匠鋪裏常有掛着很多農具，等待買客的光顧。光顧的買客包括市民和鄉民。也有小商人買了之後，挑了去鄉村或市集上轉售給鄉民。城裏工農間的交換偏重在這一類的小工業裏。

我們對於傳統市鎮的研究做得很少，因之，我手邊找不到關於這幾種不同性質的工匠數量上的比例。我們正在計劃做這項研究工作，有了結果，另作報告。現在我祇能依我的印象說。在靠近大都會的市鎮上，商業勢力已顯著的壓倒了工業，那是因為上面所說的第一二兩類的工匠正在日漸減少中。市民的消費品已大部由外洋的和大都會的工業所供給，不再僱用工匠在家裏製造了。另一方面，鄉民因為經過了長期的經濟衰落，固然無力購買大都會和外洋的工業品，生活程度降落的過程中，也緊縮了向市鎮的購買力。城鄉交換經濟因之也如游絲一般若繼若續，加強了目前片面的經濟關係，所謂片面的經濟關係就是出多入少。在出的一方面的確在增加，地租沒有減，徵實加重了賦稅，而且額外的附加，攤派，強購，以至劫奪，鄉間的生產品源源外流，所謂城鄉對立是從這現象來說的。

城鄉片面的關係，在傳統結構中已伏了根，但是因為鄉村生產力較現在為高，（鄉間原來有鄉土工業一項的生產事業而現在業已大為衰落，）而且以往城市取給於鄉村的程度較現在為低，所以還能維持一個不利於鄉村的平衡，（這平衡一旦傾側，就發生農民反抗，在歷史上過了一些時間就發生一陣，）現在由於內外的種種因素，一面打擊了鄉村的生產力，一面又加重鄉村的担負，使這片面關係更為暴露了。

討論城鄉關係的還可以注意到經濟以外的其他方面。我曾就基層行政僵化為題提出了政治上的危險局面。這幾篇文章曾引起過若干朋友的誤會，甚至有說我在提倡紳權，而且被指為荒謬理論的。我承認這幾篇文章中可能有引起這些誤會的缺點，尤其在「再論雙軌政治」中我為了要說明知識分子下鄉服務的重要，所以提到我在英國鄉間看到的情形，而說如果這些人也能包括在紳士一流人物中，則我確對他們寄託着希望。現在有些讀者看文章時對於許多假設詞不太注意，不但斷章，甚至斷句去念，加上印刷上也有缺點，引起誤會，是很難避免的。

我覺得要分析傳統的政治結構應當注意皇權，紳權，幫權和民權四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我所謂「權」是指實際的政治勢力。在這四者之間民權是最不發達，吳晗先生和我討論這問題時，曾表示懷疑「民權」在傳統政治結構中是否存在。他的意思是前三者交橫錯綜的統治着基層的人民，人民是被統治的，所以說不上「民權」。我認為在基層上有一層自治的地方公務，這些公務固然是紳權發揮的領城，但是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有關人民本身利益的事務中，還留着人民自動的組織，這組織的規模很小且很而脆弱的，但並不說完全沒有。

在這裏若干朋友的討論中認為最成問題的是紳權的性質。因為這種政治勢力相當特殊，所以我曾特別注意它，想把它的性質弄清楚。分析這現象和提倡或維護這現象絕不是一回事。這點我本來不用說，因為近來有人這樣指斥我，所以不能不把這簡單的道理在這裏提上一筆。

對於紳權有兩種看法：一是紳權乃皇權的延長，它是幫助皇權統治人民的，在這任務上得到了皇權的縱容。紳和官是一體。另外一種看法是紳權和皇權來源不同，紳權是社會經濟的產物，擁有傳統的勢力，而皇權卻是靠武力獲來的，建立在武力上。它和紳權有衝突的地方；在中國歷史上，這兩項勢力常常發生爭執，因之也時有消長。在一個時間譬如六朝門第制度堅強時，皇權固然可以用武力奪來，但支配社會標準的勢力卻握在帝皇所無可奈何的紳權手上。門第制度被科舉所代替後，皇權控制了紳衿，而且皇權的專制性也因之加強；於是紳權退取消極的守勢。紳權利用官僚機構軟禁皇權，自求逃避專制權力的壓迫。這種情形我在「論紳士」一文中已說過。

從紳權對皇權的衝突上看，他可以作為皇權專制鐵腕深入民間的緩衝力量。再從紳權發生的根源上是地主和知識階級的事實上看，它為了自身的利益有着開發和保護地方社會的興趣。所以我曾說除了它從土地制度中剝削農民之外，它可以為地方做事的，因為在人民的立場看去，還有着隨時可以來要錢要命的皇權和幫權。我這樣說並沒有忽視紳士本身的容易腐化，成為土豪劣紳魚肉鄉民的土皇帝。

還有一點又容易引起誤會的，事實也已經引起誤會的，是我所說的雙軌政治。我認為一個健全而可以持久的政治必需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軌。憲法和民主都是在加強自下而上的那條軌道。憲法是對政治權力的限制，民主是使政權向選民負責。這一層意思應當是很清楚的。發生誤會的是在我用這些概念來分析傳統政治機構。我首先承認中國傳統中沒有憲法和民主，那就是說沒有合法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但是這樣不是說祇存自上而下的單軌了麼？又不然，因為我認為在傳統政治中卻另有一種防止皇權橫行無阻的機構。於是我提出了兩道防線的說法。一道是無為政治，使皇權有權而無能，一道是紳權的緩衝。在限制皇權，使民間的願望能自下上達的作用上，紳權有它的重要性。可是我也曾立刻跟着說這條無形軌道不但不普遍，而且不常是有效的。當這軌道淤塞了，皇權的專制勢力立刻侵入民間，引起人民的反抗。我想從各種政治勢力的交相作用去說明這個動態的現象。我承認這是個相當複雜的現象，我個人才學有限，祇能捉摸着一些，可能有瞎子摸象之嫌，但是我仍願意提出來供給研究城鄉關係的朋友們參考的，那是因為討論到城鄉的政治關係時這個現象是無法忽視的。

我關於經濟和政治這兩方作了如上所（下接十八頁）

國大召開前夕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大局雖然沉悶，但南京却越來越熱鬧了。國大召開在即，南京充滿着緊張與活躍，召開國大自然先得解決國大代表問題。按照選舉程序，國大代表的名單，本來應當在各地選舉後即予公布，但由於讓與友黨問題及政黨提名與簽署當選之間所引起的糾紛問題，一直鬧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這些糾紛，牽涉到國民黨和民靑兩黨之間的糾紛者少，牽涉到國民黨自身派系之間的糾紛者多。黨方本來想包辦，選出他們所希望選出的人物，無奈一部分黨員不受約束，黨不提名，他們却以簽署的方式從事競選了。競選而未當選者，自然不成問題，成問題的就是未經政黨提名而實際上業已當選，黨在黨紀的立場上不願承認這批代表，但當選者在選舉法的立場上却不願被人取銷他的當選資格。這個糾紛鬧了幾個月，鬧黨部、發宣言、招待記者，在這個混沌的局面中增加了不少插曲。一面揹出了「黨紀」的大帽子，一面抬出了「國法」的大招牌。

國民黨內部對於這個問題充滿着矛盾和鬥爭。一部分堅持黨員必須服從黨的紀律，說黨既沒有給他提名，不服從黨就是叛黨，叛黨應給予制裁。一部分則認爲黨可以在黨的立場上制裁黨員，但雖給以黨的制裁而仍不能否認其國大代表的資格。聽說這次黨中有好幾位元老，都堅持「黨紀」是「黨紀」，「國法」是「國法」的觀點，不贊成以「黨紀」來解決一切，如居正王寵惠等元老，均曾慷慨陳辭，認爲黨對於黨提名的黨員，已盡其提携的責任，黨提名的黨員，雖經黨提名而仍未能當選者，就表示這個黨員實在不行。在這種情形下，黨用不着再支持這種黨員。並且，假如選舉失敗了的人，仍要使他當選，則何必要辦選舉，多此一舉！他們主張黨在「黨紀」的立場上可以叫非經由政黨提名而當選的黨員退讓，但願不願意退讓，非黨所能強制。黨可以開除他們的黨籍，但國家不能否認他們當選國大代表的資格。無論如何，「國法」總比黨紀爲高。據說居正曾說，司法院院長可以不做，這件事非說話不可。在國民黨中，所謂「元老」，實即「無實權」之謂。不過，假如元老們眞能拍拍胸脯挺起來說幾句硬話，拚一拚，至少在黨中，也還是多少能發生一點作用的。這次元老們的說話使黨的中央不敢硬做到底。但是政治這樣東西畢竟是勢利的東西，要看權力到底握在那些人手裏，元老們的硬話雖然多少發生一點作用，但掌握黨的實力的人也未必就能因元老幾句話就完全屈伏。所以中央提名與簽署當選之間的糾紛，至少截至記者執筆時爲止，還沒有得到最後的解決。傳說有人建議變方分任，各任三年（國大代表任期六年），未知是否可靠，果眞如此，那也眞可謂滑天下之大稽了。

在政協會議中，張君勱主張化有形之國大爲無形之國大，易言之，取銷國大，由人民直接行使四權！人民直接行使四權，這就是國大。實際上，這個辦法是保持了國大之名，而取銷了國大之實。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不贊成，結果是折中妥協，雖未化爲無形，而國大的性質和權力却大大地變了。現在的國大，實際上祇是一個選舉機關，選舉總統副總統。因此，三月二十九日召開的國大，其最大任務，就是選舉總統副總統，此外並無其他職權。

截至目前止，什麼人出來競選總統，迄無消息。以常識論，總統一席當然由蔣主席出任，並無他人參加競選，故雖經過「選」而談不到「競」。準備競選副總統的，宣傳已久的是李宗任，于右任，程潛三位。這兩天報紙上又傳出何應欽莫德惠二人亦將參加競選。孫科則表示一切尚未決定，既未決定參加，亦未決定放棄。

就宣傳已久的李，于、程三人之中，就個人風度言，大家都覺得李氏較合適。但有人又以爲于氏的希望較大，因爲于氏佔有幾個優勢：第一他有一把鬍子。鬍子本與政治無關，甚至可以說，在一個進步的國家，鬍子可能是不利於從政的。不過在中國，鬍子倒底還値幾個錢，現在社會上依老賣老，依鬍子賣鬍子者，不乏其人，所以于氏的鬍子，成了于氏的政治資本之一。第二、于氏寫得一手好字，寫好字本來與政治無關，但寫好字可以交結朋友，中國的政治是人情政治，寫對聯可以換得交情，於是寫好字也可以成爲一種政治資本。第三、于氏是新聞界「前輩」，自然有許多「後輩」來替「前輩」捧場，第四、于是黃河以北的人，假如總統是黃河以南的人，則副總統是黃河以北的人，也似乎十分和諧。所以南京早就有一種論調，說假如總統是一位武人，副總統應當是一位文人，假如總統是黃河以南的人，副總統應該是黃河以北的人。這種論調，實際上均有所指。不過無論在什麼國家，選舉從來是離不開鈔票的。據說×××籌六千億作爲競選費，這個數目簡直駭人。將來倒底鹿死誰手！好在國大召開不遠，姑且拭目待之。

國大本來祇選舉總統副總統，但記者在此却要一提行政院院長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將來中國政治裏最困難解決的一個問題。按照新憲法第五十五條，行政院院長的任命，雖由總統提名，但却需要護得立法院的同意。同時，按照新憲法第五十七條，行政院應向立法院負責：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受立法委員的質詢。立法院對于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並在某種規定的情形下，行政院長若不接受立法院的議決，便得提出辭職。總之，未來的行政院，受到立法院的極大牽制，甚至可以說，行政院院長如其和立法委員搞不好，根本無法幹下去。在理論上，這個制度本來近似英國的內閣制，但在實際的運用上，在英國也許沒有問題，而在中國也許可能發生很大的問題。現在這個立法院，一共有七百多委員，論黨派，有國民黨的、青年黨的、民社黨的、無黨無派的，而在國民黨中，又有着各派各系的，這樣一個份子複雜的議會，六七百人天天聚在一起開會，將來實際情形如何，簡直難以想像。再加上中國人的政治道德本不高，有私而無公，明明這件事情你做得到的，可是我偏偏要反對你！在這種情形下，恐怕任何人都難得做這個行政院院長。行憲以後的行政院長究竟是什麼人，現在誰也說不準。前些日子，謠傳宋子文將捲土重來，這話據記者所知，似乎沒有什麼根據。因爲宋子文近來對于廣東很有興趣，看他三月三日在廣州招待記者所發表的談話，他對于廣東相當積極，正有一套要大幹一下。因之，在這一個情形之下，南京機密圈裏忽而有一種想法，以爲將來的行政院院長，最好由蔣主席出任，而總統的人選，另覓他人。（要找個人爲總統，問題比較容易）這種「想法」，倒底還祇是一個想法，還是已經有幾分「根據」，記者不能判斷。這次蔣主席去牯嶺度歲，一任兼旬，他究竟在想些什麼，沒有人知道。蔣主席在廬，既未召集會議，亦未接見客人，他對于整個局面，作了一番全盤的檢討，自在意中，但結果如何，迄今尙無人得知。就是關于總統副總統的問題，他的意見如何，亦尙未透露。蔣主席自身對于這些問題，既一無透露，他人也便無從捉摸。一切究竟，我們祇有等到國大召開以後才能知道了。

劉戡陣亡・西安震動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記者於上期本刊報導共軍在陝北陝南發動攻勢的消息。共軍的攻勢終於引起了西安的震動。胡宗南將遭遇了他有生以來最大的挫折，他的愛將劉戡軍長於二月一日宜川一役陣亡，劉戡部下一個師長也跟着陣亡了。（編者按：中央社十日南京電：軍長劉戡及師長嚴明於宜川以西石村丹陽鎮一役殉職。）還有一個師長亦下落不明，這兩個師都折損了三分之二以上。

延安以北是由馬鴻逵部防守，延安以南及關中地區由胡宗南部負責。王震的部隊挑中了劉戡將軍的防區。原來大家都很放心，因爲劉將軍及其所部是胡部的精英，劉將軍又是去年三月二十九日「躍馬進延安」的第一人。誰料到王震集中了近六個旅的優勢兵力，直指宜川，這兒是劉戡的指揮所所在地，劉部措手不及，實在沒有料到王震敢來打硬仗。三月三號西安已經遍傳劉戡被俘的消息，雖然軍方極力防止這消息的洩露。可是商人的消息最靈通，據說這消息最初還是由商人方面傳出來的。這嚴重的挫敗，震動了西安的軍政當局。四號警備司令部與市政府的聯合會報上，警備司令和市長都承認局勢的險惡，而要求新聞界的審愼，對於戰訊的報導，和糧價的消息都要愼重，以免動搖民心。

這次劉戡挫敗的原因，一方面是輕敵，未把王震放在眼中，一方面是國軍連絡欠佳。王震圍攻宜川時，延安的國軍沒有出援。但事實上也不能出援，因爲彭德懷在米脂、清澗、吳堡一帶控制了六個旅的兵力，對延安採「看管」姿態，同時又扼住了榆林國軍南下的路。延安國軍一動，他就可能直薄延安。榆林國軍一動，他又可能進取榆林。在戰略地位上，彭德懷得到主動。大家眼巴巴看着劉戡吃虧。劉部這一垮使關中感到重大壓力。同時，隴東的共軍近一萬人，向邠州、永壽進逼。據說共軍有截斷寶雞到西安鐵路的企圖。再據未經證實的聽說共軍企圖：南下的共軍要越鐵路與陝南的共軍會師漢中。這在現階段，也許有些誇大，但共軍心目中的遠景未始不想這樣。

劉部失利的消息傳來，胡宗南的心情當然是沉重得很。三月三日祝紹周主陝四週年紀念會，他本來預備親自來對他的幹部勗勉一番，臨時又不來了，由高桂滋代表說胡主任臨時因事不能來。祝紹周致詞時，也要大家提高警覺，不要讓西安成了太原落陷第二！現在胡宗南將晉南豫西的董釗部（這是胡的最後的本錢）一起調到潼關集中，向西安增防。西安現由第七十八師鎮守，另外又調了幾個旅到陝北增防，原在漢中的青年軍二○三師也出動向東堵擊企圖竄川的孔從周部。

● 市場動態是反映戰局的鏡子，四五天來，糧價狂漲，其他各物轉疲，小麥由一百四十萬一石跳到二百四十萬，寶雞的糧價也聞風而漲，使得省市當局不得不發止非糧商不得往外縣購運糧食的禁令，而獎勵自由購運。市當局再要求市民貯糧貯煤。

這一次的動盪，使胡宗南在西北培植了十多年的誠信，完全喪失。原來他有「西北長城」的徽號，現在這座長城開了很寬的缺口。他個人自信心太強，也太自負，剛愎有餘，寬宏不足，從不聽取別人的意見。據說經過這一次教訓，他也有些自省，在今日關中的老百姓，還是只有靠他來庇護，也只有希望他來切實地檢討一下他自己。

共軍的陝北攻勢，使胡宗南部完全退出山西，使他又回原防，底定晉南還談不到，何況北上。現在只想如何擊潰共軍攻勢，保全延安，保衞關中，損兵折將的損失是擱不問的了。

記者曾一再指出共軍在陝北是要打擊國軍的有生力量，而不在攻城略地，現在這種看法充分地獲得證明。共軍集中力量來吃劉戡，不惜留置大兵於榆林延安之間，以牽制國軍，使國軍不能應援。彭德懷也不會長時期扮演牽制任務的。不久也許要開始活動，對手是馬鴻逵的部隊，就是白部長一再經揚的西北騎兵。

（上接十九面）導前是就有聯系的，因此，一下子，四縣變亂同時併發，嚇得當地政府連派要員上省告急頒兵。當局也答覆了一支「大軍進行曲」，馬上派九三旅二七九團黃團長率隊出馬親征，保安第一總隊也派了一部兵力出助。可是到了匪區一看，事出意料之外，所謂變亂，不過是些當地人民的聚衆示威行動，而且聽說軍隊到來，早已回到自己家裏去了。種田的仍在手裏握牢鋤頭，娘兒們在那裏搖他們的紡車，事情過去了，誰也沒有離開生活崗位。所以，「本年十八十九兩日：：：部隊進駐彌勒後，城中秩序良好，人心安定」。「夷民集體武力，已自動解散」（三月三日正義）。滬西舊城也沒有經過接觸就「收復」了。

觀音崖的血花

上面兩支交響曲，已成過去，但是茲外之音接踵而來。原來在稍後一個時期，保安二總隊少將團長張仲強，率領營長趙澤民及連長排長各一，士兵六十餘人，全部武裝，由箇舊出發到滇南江外，辦理巨匪趙稱昌的招安手續，張氏本人，爲人精明強幹，勇謀兼備，在抗日戰爭中，第一次在「台兒莊」初獻身手，以一個團的兵力，孤守據點，連挫頑敵，在湘北（長沙）三次大捷中，張氏三次都參加火線，實爲盧漢手下一員難得的驍將。這次到江外招安，於行抵觀音崖的山附中，遭匪暗算，除張氏及營長趙澤民連長排長均被殺害外，帶去的六十餘人，也只剩了一半負傷掛彩的回來，所攜武器財物，全部被匪洗去。據說張部員兵到了觀音崖山附，剛想打算休息，腳還未定，遭遇匪伏，槍彈就從兩旁山林中奔射出來。營長趙澤民首先應聲落馬，接着連長排長相繼中彈倒地，士兵一時大亂，還來不及找個適當地點還擊，六十餘人就傷的傷死的死了。張氏本人，大概當天並未犧牲，或許有一個時間曾經做了土匪的俘虜，因爲他的死屍在第二天才於山頭上找着的。並且保安司令部接的電報，也說他當天是失蹤，第二天才證實犧牲。

這眞是「大海大洋都過了，却溺死在陰溝中」。

主席盧漢聞噩，極爲悲痛，愛之既深，責之也切，盧氏一面以悔恨的口吻向記者說：「他太自信，太疏忽」，一面派了尹參謀長南下處理善後。

星星之火隱藏在冬枯的山地

其次關於雲南省境的匪患，無日或已，幾乎遍地皆是。人數三個五個，三十五十，三百五百，多寡不一，搶劫事件的通訊和消息，佔據了報紙的不少篇幅，例如：「文山縣城被匪八十餘人於深夜九時竄入洗劫」，「滇桂邊境有股匪二千餘人流竄」（觀察報），「劉昆所匪百餘人盤據思普邊境」，（民意報），龍武、曲溪一帶的白小七自正貴龍永和等一股，也有數百人，時而投順招安，時而背信生變。滇東的曲靖、宣威一帶也有不少股匪打劫行商，擾亂地方治安。而滇川邊境的鎮雄、威信縣境，地方政府整日忙於聯防剿匪。滇西區稍爲寧靜，但一向盤據滇川、蘭坪等地慣匪，迄未剿平，紛擾不已。似乎把「盜匪」當做最普遍的職業了。

爲什麼這樣亂呢？

記者於本文一再指出：亂的根源不在「赤色細菌」的傳播，主要癥結是在「民不聊生」。

三月四日於雲南呈貢

縱談東北大局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瀋陽通信）回到別離十四年的瀋陽將及兩年，心頭始終像是壓着一塊鉛。善良誠樸的百姓們的受苦受難使你惘然於懷，顢預貪汚的要員們的倒行逆施使你窒息欲嘔。弄來弄去，戰火終於延燒到瀋陽的大門裏邊，日來在瀋陽城防工事的範圍以內已臨有戰事發生，夜靜時可以清晰的聽到槍砲的聲響，數月來的圍困之局已使物價高不可攀，升斗小民大都是家無隔宿之糧，在酷寒的氣候中列着長隊等候買平價米，往往是等了一天終於悵然而返。最慘的還是流亡來瀋的幾十萬難民，當政府和本地人民都正自顧不暇的時候，誰還有心情有力量來救濟他們？全家老小在刺骨的寒風中坐在馬路旁邊雪地上哀號，第一次聽見看見的確夠受，次數多了，也便祇能熟視無睹，充耳不聞了。春天的氣息已從南風中隱約傳來，但東北老百姓却在折磨中等待着一個命定的悲劇高潮的來臨。

前年年初，杜聿明將軍率領大軍出關，雖然遇到多少次硬仗，但大致可以說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那一年，眞可以說是出關國軍的黃金時代。到年底的時候，北邊似已隨時可以進取哈爾濱，南邊則已推進到鴨綠江邊的安東和位於遼東半島尖端的普蘭店貔子窩；旅大已成囊中之物。當廖耀湘將軍率領他的新六軍掃蕩遼東半島並協助五十二軍攻克安東凱旋瀋陽的時候，有人問到他新六軍在那一次戰役中的損失如何，他意氣豪邁的答覆說一共死傷八個人。當時據某高級將領吐露，只要最高統帥有令，隨時可以拿下大連；北邊的哈爾濱也許比較麻煩些，把握還是有的。在這段因循期間，共軍在松花江以南是避實就虛，保全實力，而在江北的根據地則在厲兵秣馬，準備大舉。到去年大地回春時，東北共軍已經易被動爲主動，以進攻代退守。直到去年五月，共軍發動所謂五次攻勢，長驅南下，到處得心應手，一直打到鐵嶺，瀋陽震動，後來主力回師四平，陳明仁部拚死奮戰，打得兩敗俱傷，終於由四平的保全而結束了這次攻勢。從那以後，國軍便開始走下坡路。杜聿明去，熊式輝兼理軍務一個時期，情勢轉爲密雲不雨，在陰霾重重之際，去年九月初陳辭修將軍以參謀總長之尊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常川駐瀋，直接指揮東北戰事。但是在部署未定之際，就遇到共軍六次攻勢的當頭一棒。這一棒打得正要緊，以致國軍一直未得有適當的部署，完全陷入挨打的態勢。北寧路一直未能恢復通車，瀋陽週邊不時有戰事發生。在十二月裏的某一夜晚，瀋陽鐵西區竟然落了若干砲彈，東北之戰已經變爲保衛瀋陽之戰。大家所關切的已不是東北戰局如何開展，而僅僅是瀋陽之能否確保。陳辭修將軍蒞瀋時，曾偕守衞大同名將楚溪春將軍同來，指任瀋陽區防守司令官，楚根據他守大同的經驗，設計修築瀋陽城防工事，徵調民伕挖掘環城壕溝，市區內亦遍築工事，在各街道上每隔數千米便有地下堡壘一座。但是，瀋陽終究是一個大城，不能和大同同日而語，因爲事實上，小股共軍已屢屢竄入瀋垣的範圍以內。至於遍佈市區的堡壘的效能如何，在城防工事完成之日，楚司令官曾作試驗，方法是把幾隻羊放在堡壘裏面，然後砲擊堡壘，結果那幾隻羊不但絲毫未受傷害，而且似乎連震盪都沒有受到，所以對於城防工事的效能非常滿意。楚司令官後來改任河北省主席，臨去之際發表談話，還以不能親自實際發揮那些堡壘的效能爲憾。但是無論那些堡壘的效能如何，我們一百五十萬市民到時候並不能像那幾隻羊一樣幸運的躲進堡壘裏面去。

陳辭修將軍到了東北，的確受到東北人民衷心的熱誠歡迎，因爲一則陳氏身膺參謀總長重任，中央派他來是表示政府非常重視東北，而且一般人直覺的相信他有辦法克服東北的軍事危機，二則當時東北政治風氣已漸趨糜爛，人民喁喁望治，把希望都寄託在他身上。我當時看到瀋陽最繁華的中街的一家商號的玻璃窗上貼着一條標語：「陳總長來瀋，東北人民大悅。」這句話不是泛泛的歡迎標語，的確可以代表當時東北人民的心情。陳氏也眞是勵精圖治，想有一番作爲。他在各界歡迎會上把自己比作一個守節多年的寡婦，他說他過去不曾貪汚過，要大家相信他不會到五十歲以後還變節。他清查前任要員匯出的來路不明的鉅款，雖然這事終於不了了之，但在當時確是頗爲振奮人心的。他簡化駢枝機關，倡行效能政治。小的不合理情，如軍政機關首長私宅的電話電燈，他都要加以限制。他並且不遺餘力的整飭軍風紀。接收以來，東北是處於軍事時期，軍人一向是天之驕子。遇到半點不如意，「老子抗戰八年，」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個上士班長可以到一個地方很快的娶一個太太，佔一所日本人留下的房子作公館，太太手上帶滿金鐲金戒，一般老百姓不以爲怪，認爲那是「國軍的太太」的當然裝飾。一旦調防他去，往往是把太太寶劃娘家裏面。這些不可一世的英雄，現在居然有人來不客氣的加以管束，限制他們的惡行，廢止他們的特殊待遇，無怪乎陳氏有「得了民心失了軍心」之感。而且，據說陳氏和杜聿明過去曾有私人的間隙，這次陳氏對於杜的種種行爲完全由法的觀點予以清查，而以杜氏的赫赫之功，他對於陳氏的處置當然有所不甘。並且東北的將領當中，不少是在遠征時代和杜氏有過袍澤之誼的，所以也因此影響他們對陳的感情。所以陳氏對於東北軍事指揮之不能得心應手，已成定局。平心而論，陳氏在東北的措施，姑不論效果如何，其用心至少是無可非議的，不過有時給人的印象是氣度稍狹，失之偏激而已。

本年一月月底，政府明令發表衞立煌爲東北剿匪總司令，當時陳氏曾在集會中宣稱他今後將專心致力於整頓東北政治經濟的工作。但他終於二月四日帶着多病的身軀和不大愉快的精神飛離瀋陽。——剿匪總部成立後，行轅的龐大機構已多半劃歸剿總，行轅已遷到狹小的第一招待所辦公，從此東北的局面又轉入一個新的階段。

大致說起來，東北的接收工作是失敗的，貪汚事件層出不窮，因爲中間一度經過蘇聯的搜括，原始清册大部無着，所以有一個可以混水摸魚的客觀環境，清廉自守者固然很多，存心淘金而來者亦不乏人。兩年來，被治貪汚罪的雖有幾起，但那不過是些沒有人撐腰的蒼蠅吧了。有辦法的人，在東北正像中國其他各地一樣，貪汚並不是犯法的事，不過東北尤其是一個天高皇帝遠的世外桃源。結果是國家倒楣，老百姓遭殃。五次攻勢時，北寧路尚通車，大大小小的發接收財的人們在爭先恐後啓運他們的財產，北站上物品堆積如山，我親自聽到一個誠樸的當地老百姓說，某某人來時不過帶一隻包袱，現在爲時僅僅一年，居然有二十幾隻箱籠運走，街談巷議，大都是某某人是作什麼的，現在運走多少家私。這還不過是大家都看得見的人物，若干高高在上的人，則都是包幾節車廂搬家，那時瀋陽市民的確有些憤憤了，再加幾家地方人辦的報紙也都厲聲抨擊，大

[illegible]道的[illegible]是些什麼東西，來源如何，當時正值台灣事件不久之後，地方當局的確有些戒心，幸而五次攻勢很快結束，他們的捲逃工作稍為緩和，大批財富得以化整為零的從容運走。

在接收人員中，潔身自好想為國家作點事情的人自然佔大多數，不過他們起不了大作用，還得時時提防着在驚險的政治風浪中如何保全自己。特別是一些流浪多年重返故土的東北籍公教人員，他們確是想用自己的熱血，來灌溉這片荒蕪的田園，但是大環境如此，大家見了面只有相對牢騷。老百姓總好把現在的施政同過去敵偽時代比，一個七十多歲的士紳說，「除了日本人壓迫中國人外，我們樣樣都應該學習他們」，這很可以代表一般東北老百姓的心情。日本人的長處沒保留，從內地帶去的恐怕也只有內地的劣點。從前的漢奸特務，搖身一變，又是權貴，使老百姓瞪目結舌，莫明其妙。不但東北的漢奸不懲辦，連華北的漢奸也有不少到這片「租界」來避風。瀋陽東北民報曾發表一篇社論，主張應輿情，第二天當地中央日報馬上有一篇社論駁斥，罵民報為「奸黨的尾巴」，「想乘機撈些外水」，這種高論之奧妙何在，一般人無從窺知。人事的任用，只問親不親，不問賢不賢，和敵偽時代的制度全然不同，地方老百姓也看不慣。瀋陽教育局長陳碩彥，為最初冒險接收之一人，在艱難條件下切實苦幹，頗有政聲，深得全市小學教師之愛戴，終因派系關係，某教育最高當局於去夏蒞瀋時忽然發表調陳到部任職，換一位從事黨務工作的繼任。過了不久，陳氏竟悄然往北投奔梁山去了。這件事對瀋陽教育界人士的心情很有影響。後來瀋陽市政府對所屬公務員及全市中小學教師實施三人連坐具結辦法，效果如何，尚不得知。

前年夏初記者到瀋陽時，高粱米是流通券十元一斤，現在已漲到四千元一斤。老百姓說敵偽時代苦是苦，但是物價平穩，定量配給，總還可以活，現在的日子是過了今天不知明天如何。瀋陽一個小學教師的待遇是月薪流通券七八萬，不夠一個人買六萬，這種待遇和他們的任務絕不相稱。到瀋二年，天黑後從不見有警察值崗，不知此事和待遇是否有關。東北經日本十四年壓榨，人民不過是大貧小貧之別，瀋陽很殷實的士紳大都穿破舊衣服，極少數也許是裝窮，大多數確是買不起。冬天氣候酷寒，燃料昂貴，人民生活格外困苦。鄉間一般小佃農也都掙扎在飢餓線上，富農們也大半在拉鋸戰中失去他們的收穫。不過農工商界，總比較算是好的，最苦的當然是公教人員。去年十二月，國立東北大學一個底薪四百元的教授可以領到流通券二十五萬元，同月該校一個公費生主副食費總數是三十萬元，今年一月雖已調整，但因缺乏現鈔，尚未全數發給。

偽滿幣和台幣以前都是和日圓等值使用的，接收時把滿幣（以流通券代替）與法幣的比率定為一比十三，台幣與法幣為一比三十。事隔兩年，台幣已躍至一比一百三十，流通券的黑市已降至一比七——實際的價值比這還低得多，因為投機份子能利用流通券按官價匯出，。到這時候，當局還說是為了東北人民的福利，決定不廢除流通券，也不許可法幣出關，這又是什麼玄祕？

日本留在東北的資產，都是東北老百姓的血汗結晶，現在都應該用於改善東北人民的生活上面，但大都被中央機關接收。而若干地方行政機關以及文教機關經費支絀到意想不到的程度，以致很難作些事情。當瀋陽大鬧房荒的時候，和平區日本人留下的偌大一片房舍仍一直為特權階級的專利品，不能由於公平合理的分配而作適當的使用。

許許多多的因素，使得人民對政府已經失掉信心。知識份子苦悶不滿，青年學生徬徨無依，這是一個極其微妙繁複的現實。東北大學過去一年裏最多的只上四個月課，學校當局要看學生會幾個首腦人物的臉色行事。東大學生十分之八是當地偽滿學校出身，他們重投祖國懷抱，卻還是無依孤兒寄託精神的領導。

軍風紀的廢弛，以及久戰無功的事實，已使士氣低落到可慮的程度。共軍的士氣本來也不全好，老八路的戰鬥情緒還好，當地徵集的大量新兵都是一有機會就臨陣脫逃，不過他們既打了勝仗，整個士氣自然就容易變得好。

現在東北的局勢固然要靠大批援軍來挽救頹勢，但最基本的是要有新人物，新作風，新辦法。要政治清明，民生安定，要有一種開明進步的氣氛，讓成千成萬的青年在無背於自己良知的原則下發展他們的心靈，讓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份子有機會為他們的國家出力。這幾天，在瀋陽的人看到平津的大報上，以特號大字在第一項要聞地位刊載東北元老即將出山的消息，好像元老諸公一旦出山，蒼生即可得救，事實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我們身居危境的人，對於這類消息，不免有啼笑皆非之感。

觀察合訂本

特價尚餘十天．三月底截止

定售每冊三十萬．特價每冊二十二萬

郵費掛號每冊一萬．航掛每冊十一萬

[illegible]能適的分析之後，也曾提供過一些改善的意見。在這方面我祇能從制度上及原則上立論，至於改善的方法則是另一問題。在政治上，我認為傳統的機構已經不合當前的客觀環境。（這點我是一再說明過的，無奈有人說了我留戀過去慣作夢囈之後，讀者不看原文，竟跟着亂罵了。）我曾強調說無為政治是做不通了，因為現代社會必須有個有能的政府，中央集權並不就是專制（曾舉英國當前的政府為例），祇要這集權政府向人民負責。負責並不是拍胸脯，而是由民意決定它的去就。換一句話，自上而下的政治軌道得講究效率，而同時更重要的是必須確立自下而上的有形軌道，那就是代議制。皇權變質而成負責的民選中央政權，紳權變質而成民間的負責立法代表，官僚變質而成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的公務員，幫權（我還沒有詳細分析過的一個政治勢力）變質而成工商業的公會和職業團體，而把整個政治機構安定在底層的民主基礎上。我所謂「變質」並非改穿洋裝，而是從傳統封建性質變成現代民主性質。我這樣說明了，希望有許多曾誤會我的讀者不致再認為我是在提倡紳權了。這樣變了質，在政治上城鄉不再是統治關係，而成為組合關係了。

在經濟方面，我在給姜慶湘先生的一信已有過一些說明。我認為在鄉村中復興工業是很重要的。但是所建立的並不是落後的家庭手工業。關於鄉土工業的內容，我最近又寫了三篇「伸論鄉土工業」，將在大公報發表，希望讀者能明白我所謂鄉土工業，在技術、組織、經營、各方面是怎樣的。

要改變鄉土工業的技術，最主要的是鄉村電氣化，英美蘇聯都在努力向這方面做去，因為這是最基本的，動力改變之後，工業的規模和組織方能談得到改善。在這裏我不再贅述了。

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我主張復興鄉土工業並不包含取消都市工業的意思，兩者並不相衝突的。有許多重工業和重大的製造業是不能夠分散的，那些不妨留在工業中心去經營。我祇主張把可以分散在鄉間的工業盡量分散。

城鄉對立是病態，它們本是相輔相助的經濟配合體。我們最後的目標是重建城鄉的有機循環，互相有利的配合。我極願意繼續在這問題上多作思考，但是同時也極盼望讀者能多多發表批評。

孝通　三月十日

關於雲南最近一連串的民變的詳細報告

苗伯駱

瑞麗邊胞之變

瑞麗設治局，位於雲南省極西，與緬甸緊鄰，為滇緬公路出境必經之地，適扼中緬交通的喉頭。本年一月五日，突然發生空前民變。變的原因和開端，據報載：「部份居民因抗剷烟苗，致釀成局部民變。……此次民變原因甚為複雜，遠因乃瑞麗設治局長舒自天苛征暴斂所造成。」（一月十二日復興日報）這段簡短的通訊，不論其正確性如何，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兩點重要事實：一、政府官員「苛征暴斂」所造成的結果是民瘦官肥，民餓官飽，乃至民不聊生。二、人民在不斷的負担下，被迫拋棄了得不償失的正當農耕，而轉向違法種烟（鴉片）。現在政府要禁要剷，這些「誠直樸實的邊民」（正義報語），生活基礎有了搖動，當然只有抗剷和暴動了。民變事態於六、七兩日逐漸擴大，由局部推及全面，劃八、九日：「碗町對岸九谷於數日內搶劫事件迭出，邊地秩序極度不安」，乃至於「設治局長舒自天已撤退到碗町」，甚而影響到「海關令起暫時停止辦公……中緬入口貨物亦暫時停止進口人心惶惶。」足見情形惡化，日趨深刻。到了十日，「碗町保山間電訊斷絕」，愈顯情勢緊張。在這小康局面下的雲南，一連串的警報傳來，頗叫當局手足無措。有些人，很習慣地把「紅帽子」拾上場面，公然說是「奸黨」的滲透所致了。後來大家把事態看清楚了，才大聲疾呼地說：「這是普通民變」。這樣一來「戲」的方式也才有所變更，作為一個軍人的何紹周（警備司令）率先提出了「撫重於剿」的口號，而恰當這時，派遣出去進剿的九三旅二七七團一營人「被阻於碗町山後之庶放河，並與亂民山頭人接觸發生衝突，今日庶放河之山頭人愈形增加，抵抗軍隊前進」。（十二日正義）由此可以看出，變民的實力確屬不小。十四日復興日報曾這樣報導：「此次山頭的變亂民衆約三千餘人，彼等除有新武器外，並有大砲數門」。這種裝備，加上地利的優勢，國軍被阻自是定理。事變的本質既如上述，「懷柔政策」自比「槍桿萬能」較為適用。六區行政專員李東山親自到變區調停，幾經往返跋涉，數度洽商之後，果然「變民三千解散回家」，到了一月十五日，瑞麗事件才算解決。

三姚的野火

和瑞麗事件先後而起的是「三姚之亂」。所謂三姚，是指滇西的大姚、鹽豐、姚安三縣。大約在一月尾，市間忽傳滇中永仁、大瑞、鹽豐、姚安等縣，竄到大批股匪，在該縣境內從事各種異樣活動，並且還說永仁大姚等城一度被匪侵陷。消息傳來，全省震動，謠言紛紜，不可終日。奇怪的是，事情發生後，官方照例封鎖消息，吃辭了酒裝睡樣，以圖粉飾太平，聽讓人民胡猜亂想，以訛傳訛，越發增加了社會的不安。直到已經「不是什麼軍事祕密了」，才見報上放出馬後炮來，一些治安當局也才開始了「失晨之雞」的說話，而且還要表現出鄉下姥進城「裝模作樣」的派頭。其實這一批「股匪」，據官方後來宣佈，其領導人名叫段英，戰時曾任二十師參謀主任，勝利後編入十六軍官總隊當大隊附，去年軍官隊遣散，這位軍官失業。當初他曾去找省府主席盧漢討差，結果是吃了閉門羹，隨後就入山落草。至於他所率領的人數，據民廳員任人說：「有時化整為零有時集零為整，至目前為止，關於匪徒之數目，尚無確切之報告」但根據他盤據的地區和分佈的情形，以及新自該地的來客所談，可能有八百人左右。這一批人：「行蹤極有機動性，組織尚為嚴密，決非一般傳說烏合之衆也」（二月三日復興）。不僅如此，該部尚且「自稱民主聯軍滇西縱隊，以封富濟貧為口號」（一月廿八日平民）。在事實上也做到「專劫槍彈，很少搶財糧」。在他們需要糧秣的時候「均以大戶為對象」而且「多以書信索取」。（二月三日復興）假如這批人單純的是這樣了，那麼與亡命徒無異，可是，他們却「到處強貼荒謬標語及宣傳品」（三月三日正義），民政廳就接到好幾份。接永仁縣長的報告：他們還反對政府的三征政策，反對內戰，反對美國軍事援華等，足見該匪也有其羣衆鬥爭路線。復次段英本人既為軍官總隊被遣人員，對於他的失業同志，自然大事招攬，冀圖擴張勢力。據說僅僅失業軍官閻風前往投效的已有二百多人。這些吃過粗米飯的丘八除參加進去，給政府的戡剿前途，添了不少麻煩。關於當局的進剿，警總方面派了九三旅二七九團的一營人，於元月廿三日由昆明出發。可是這營人到下後，還不聽見展開戰鬥的消息，僅僅把部隊分遣駐札大、鹽、姚等縣治城，維持城區安全。省府方面也派了保安第四第六兩總隊主力一部，前往助剿。但一去月餘，迄無接火之說。據說不動手的原因，是當局曾經寫信給段英，叫他率部投誠，歸來自當重用。這件事是由行政專員楊炳麟去辦的，但是還無結果。因之三姚之亂到記者執筆時止，仍屬懸案。

民變的浪潮席捲了滇南山地

民變之潮，從滇南的極西泛濫而起，隨着春風的吹來，澎湃的潮頭，開始吞捲了滇南山地。在康平的雲貴高原上，千百萬人民的呻吟，變成企求生活的狂吼。此次滇南彌勒、瀘西、邱北、師宗等縣的集體民變，尤其表現得強烈。彌、瀘、師、邱各屬，原為綠林豪客嘯聚之地。在風調雨順的年頭，尚能勉強平安無事，近年來天災人禍不斷的襲擊了該地人民，於是為着生活，他們不復懾於死亡，暴亂成了他們唯一的生存手段，行動代替了申訴。在本年二月中旬，民變的爆杖，在那裏發出了搖撼山岳的巨響。暴動的起因據官方說是為了「奸匪煽動當地夷民抗剷」，不論其真實性如何，但以普通邏輯推論，還有兩點關係是不言而宜的，即一、往年剷烟一樣的剷，惟無集體暴動之事，二、這裏有句俗諺「委員下鄉，百姓遭殃」！這種情形既已行之有素，那麼那些藉名剷烟的委員，似無例外。以上兩點，不必詳加解釋已可領會，而當地夷民遂用長槍短炮，大奏其歡迎委員「下鄉曲」了。這支曲子頓挫抑揚，聲色俱厲，而場面的偉大，據官方報導：「這次民變性質大為不同」，初非挺而走險之歹徒可比，參加的人數不下萬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地方土著，內中還有很多知識份子參加領導行動。變民一開頭就把各縣「公路及電線路大舉破壞」，圖與外面音訊隔絕，以阻政府進剿，其嚴重的程度，有如晴天霹靂。「十一日上午，彌勒至大麥地之鄉村電話突然中斷，瀘西、邱北、師宗三縣消息無法獲得……至下午彌勒城即被包圍」。（二月十六日復興）在同一時期，「瀘西舊城被匪攻陷」。這是相當動人心魄的，可以看出這是

（下接十六面）

故國風光

戴鎦齡

偶然想起王漁洋「故國風光在眼前，鵲山寒食泰和年，邗溝未似明湖好，名士軒頭碧漲天」一首絕句，不禁為之神往。我雖為蘇人，雅不願和漁洋爭辯邗溝明湖二者的得失短長。反之，我卻同情他對於他的故國的留戀，他遙憶的鵲山、明湖、名士軒等，似乎確有引人入勝的地方。從而我又想起老殘對於這座城所稱的「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甚至杜甫詩句「歷下亭子古，濟南名士多」，種種憧憬和幻想在腦海中交織着。

可是我很慚愧並未到過這座城。當我有時唸起這首詩，朋友們笑我了，「它有那麼動人麼？你不要為詩人的美麗的句子所欺騙。」我頗窮於答辭，因為我明白這些朋友不少在那城自小長大，衣於斯，食於斯，鞠育於斯，他們的認識自然比我真切，但他們並不十分贊成我追隨漁洋的讚歎，可見這讚歎不免是一時感情蒙蔽所造成，不完全施用適當。奇怪的是：漁洋何嘗不明白這點，他寧可願意為感情所蒙蔽，寫出這首詩。讀他的詩的人，包括我在內，也寧可願意為感情所蒙蔽，欣賞他寫出的句子。

用實事求是的精神揭開感情的蒙蔽，我們自以為得到科學的真理，但這幅詩境也就消失了。所以我們如果真到那座城一遊，考究一番它的一般景色，以及是否「名士軒頭碧漲天」，我們或許發見一些並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因而將從這首詩所獲得的美麗的幻像付諸流水，豈非一件可惜的事。

我們往往替自己製造這樣可惜的事。「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是何等的詩境，卻有好事者去考證那夜半鐘聲的真實性，等到他考證得頭頭是道，這幅詩境也撕裂不成片段了。記得抗戰期中，我寄居四川西南部某縣，每當天朗氣清，於朝暾夕暉中遠眺峨眉山，覺得它秀麗無比。後來我走百來里路，發願去朝峨眉，從山腳步行至山頂，有如一個普通香客，三四日遊程，固然收穫豐富，但不如以往想像中的豐富；尤其山中廟宇的破爛，給我一個不愉快的印像。自此「峨眉天下秀」這句名言在我腦子裏失掉一部分魔力，才知陶詩「悠然見南山」悠然二字的妙處。假使真地身在南山中，反而無從見出「日夕佳」的山氣，更體味不到此中的「真意」。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甚至說，「我們何須看過到過雅羅河，大可不必，否則我們會後悔的；我們內心有一幅景象，為什麼毀掉它呢」？龔定盦也如此說，「未濟終焉心縹渺，百事翻從闕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

「故國」，「悠然」，「縹渺」，表明時間空間上有了距離，而詩境乃由此而生。人情忽近而貴遠，當前的事物，因為聽慣看慣，總覺得平凡甚至討厭。可是時空的距離，似乎替那些事物圈上一道燦爛的光輪，於是本來被人忽視的現在卻在那道光輪中着了魔力吸引我們，即是臭腐的也化為神奇了。不管美學家說的藝術和實際人生有間隔是否可全信，上面的事實則無人能否認。西方人常說：在隨身僕人的眼裏，誰都不是英雄。反之歷史上傳說的英雄卻都是偉大的，而且愈古愈受尊敬，每個民族的開國祖先盡是半人半神的。我們推重過去的事物和人，我們眷戀過去時代本身，認為比我們這時代好。所謂人心不古，世道日下，似乎一代不如一代墮落下去了——其實這是從時間距離所生的錯覺。英國史學家麥考萊比喻這種錯覺為在沙漠中跋涉者所遭遇到的迷景。然則三王五帝之治，也不過是從文人想像所產生的迷景，在若有若無之間。空間距離也有製造迷景的作用，愈遠似乎愈值歎賞。詩人坎柏爾（Campbell）說，「景色因為遠才起誘惑」。拉丁成語告訴我們，「遠方的東西更令我們喜悅」。陶詩「悠然見南山」也是一例。所以畫山水的貴取遠景，寒汀烟渚，疊巒危峯，皆宜遠觀而不宜褻玩。而杜甫題王宰畫山水也恭維道，「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近代西洋印像派畫家講究光線和陰影的關係，採用如烟如霧的模糊光景，也是為了增加空間距離所生的效果。推至日常事物，外國普通習見的東西，到了我們手中便成為殊方異珍；有如前代被遺棄的破鐵爛銅，在後人心目裏是值得陳列收藏的古董。人情忽近貴遠是多麼牢不可破！距離，無論為時間的空間的，似乎是天然化妝品，一經點綴，則醜的美，媸的妍。

抒情詩人也常利用這距離，增加他的詩的效果。假使過去和遙遠在詩人心裏停止作用，則世上一大半抒情詩將會喪失了詩境。古人說，「登高能賦」。惟有跳出眼面前生活的窄狹圈子，從更高處去看生活，才能透過空間時間的羈束，悠然而動遐想。前人盛稱杜甫的「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即因他在十字中能放眼遼闊的地域和綿長的時代。大詩人集子裏這種句子很多，如「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又是從杜詩聯想到的一例。

一旦詩人跳不出眼面前生活的窄狹圈子，困於周圍的腐敗事物，則感覺遲鈍，缺乏超空間時間的幻想，新古典時代英國詩人正犯了這樣的毛病。後來浪漫主義抬頭，英國詩歌重新獲得活潑的生命，乃由於詩人們的目光突然展伸到過去的世界和迢遙的地方。哦特式建築忽受鑑賞是一個顯著的例子——這是中世紀的而且是東方野蠻人的啊！所以詩人華茲華斯問蘇格蘭高地的刈禾女：唱的什麼？也許她哀歌着「前朝不快意的遠事，以及古代的戰爭」。這兩句譯文的「前朝」，「遠事」，「古代」，不足以表達原文的神情，然相當足夠表達詩人內心憧憬的方向，因而批評家說這兩句異常富於弦外之音，簡直是英國浪漫詩歌復活的前奏。誠如法國勒古伊（Legoui）教授所說：浪漫主義的二大要素是：從距離所生的誘惑以及因悵惘而起的憂鬱。事實上二者有不可分性，由於可望而不可即的時空距離的誘惑，我們才不滿意眼面前窄狹平庸的生活，對過去和遙遠生出悵望憂鬱之思。「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人愴然涕下，由於念到天地之悠悠。

正如上面說到的「故國風光」，本不是眼前的，而偏從回憶中湧現到眼前，所以覺得親切動人，值得回味。其實漁洋的其他傳誦的作品，如秦淮雜詩、白門秋柳等，都是借思古懷遠，排遣詩人的胸懷。這種思古懷遠的情懷，構成中國抒情詩歌音樂的基音，雖然表現的程度有強弱，運用的方法有差異，而着筆的題材也有不同。

（上接第二頁）沒有三民主義的字樣，但內容實在充分表現三民主義的真諦。在目前的世界，目前的中國，凡是真信仰三民主義的人應該拿出這些主張，時勢需要，誰也不能否認。三十二條每一條都言之有物，或者基於三民主義的理想應該如此，或者針對過去及現在的事實，提出具體的改革方針，各有其價值。我似乎不必畫蛇添足，一條一條的代加說明，因為他們不久就要出版刊物，大家自然可以了解這個會的一切一切。

世界既然不幸而兩極化，美蘇對立的僵局愈演愈烈；國內戰亂的烽火，一天天更響更近，在這個時候，有人能出來本着理想叫喊叫喊，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事了！如果更能持之以恆，用毅力堅持所見，不斷的拿主張求團結，由團結而發生力量，一方面影響中國的政治，一方面使世界的讀書人士並非一定都是捧貪污與無能的政府的場的；凡此種種，我們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成立，都抱有很大的希望。

周一志 三月十五日 上海